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集刊
第 68 期（民國 99 年 6 月），51-96
©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

清季啟蒙人士改造民眾閱讀習慣的論述*

張仲民**

摘　要

閱讀的歷史同禁書的歷史不可分割，在前現代中國，一直都存在禁止民眾閱讀「淫辭小說」類書籍的論述和行為。時至清末，啓蒙菁英憑藉西來的思想資源，進一步認識到小說、戲曲的巨大社會作用，並反思通俗小說、戲劇與義和團事件的關聯，將閱讀和啓蒙同民族國家聯繫起來，決心努力創造出「淫辭小說」的替代品——新小說、新戲曲，改造民眾的閱讀，以開民智、打造新國民。但新小說和改良戲曲也一樣是眾聲喧嘩、多音複義的論述空間，對於各種各樣的人來講，其意義不同，並非僅具有啓蒙取向。況且民眾閱讀文化本身也有其內在邏輯，不可能完全受制於外來的規訓，清季啓蒙人士改造民眾閱讀習慣的成效終歸有限。

關鍵詞：「淫辭小說」、下層民眾、新小說、改良戲曲、閱讀習慣

* 本文承蒙兩位匿名評審人提出諸多寶貴修改意見，惠我良多，特致謝忱。
收稿日期：2009 年 6 月 2 日，通過刊登日期：2010 年 4 月 16 日。
** 復旦大學歷史學系講師

一、引　論

閱讀的歷史同禁書的歷史密不可分。從查禁一方立場看，禁書總有正當性，其目的在於通過禁止某些文本的出版或流通，使人們不接觸在禁書者看來不合法或不夠合法的知識，從而達到查禁者的政治、意識形態或道德、宗教上的目的。而通過對「禁書」的考察，我們就有可能知道在特定的時代、特定的空間中，那時的人應該閱讀什麼和不應該閱讀什麼，為何要限制閱讀及其成效如何等問題。

在中國，歷代頒布的禁書之令為數甚夥，而清代尤甚。撇開政治層面的禁書不提，清代禁書令中有許多是針對小說、戲劇、唱詞等通俗文學的，其查禁這些通俗文學類書籍，往往指以「淫書小說」、「淫辭小說」等名稱，以其於風俗人心、社會秩序大大有礙——「誨淫誨盜」——而禁之：

> 一切鄙俚之詞……大率不外乎草竊奸宄之事，而愚民之好勇鬥狠者，溺於邪慝，轉相慕效，糾夥結盟，肆行淫暴，概由看此等書詞所致，世道人心，大有關係。[1]

這裏所謂的「誨淫誨盜」，多是統治者和士紳菁英的強加之詞，便於為查禁行動尋找合法性。實際上，這些文類雖包含有不少情色、非聖無法成分，[2]可亦承載有很多正統社會推崇和宣揚的教化觀念，有嚴肅與正統的一面，情欲、暴力和教化在此是相輔相成、互相為用的。當然，其中的某些文類確實屬於露骨的色情之作，內容非常淫穢，儘管自序「十九以勸誡為藉口」。[3]

此處姑且不論其中所禁之書是否「誨淫誨盜」和是否當禁，類似禁令的屢

---

1 〈嘉慶七年十月禁毀小說〉，收入王利器輯錄，《元明清三代禁毀小說戲曲史料》（增訂本）（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1），頁 56。

2 比如，許多農民起義便是直接襲用《水滸傳》等書中的口號與組織形式，從明末之李自成、張獻忠，到天地會、湖南瑤民起義，都是顯著例子。有的甚至連戰術、戰略亦效法《水滸》，例如張獻忠「日使人說《三國》、《水滸》諸書，其埋伏攻襲咸效之」。參見羅爾綱，《水滸傳原本和著者研究》（南京：江蘇古籍出版社，2000），頁 237-266；孟憲承等編，《中國古代教育史資料》（北京：人民教育出版社，1985），頁 424。

3 錢鍾書，《管錐編》（北京：中華書局，1994），冊 1，頁 110。

次頒布與諸多論述的不斷生產，雖可表明朝野間對此問題的關注及警惕，但在某種程度上，似乎更說明這類禁令與論述的實際效力或許並不大，「功令雖有嚴禁之條，而奉行者多以爲具文」。[4]即或有厲行禁令者，也收效甚微，「思夫淫辭邪說，禁之未嘗不嚴，而卒未能禁止者，蓋禁之於其售者之人，而未嘗禁之於其閱者之人——即使其能禁之於閱者之人，而未能禁之於閱者之人之心。」[5]另一方面，自然也表明這類書的普及程度與影響力——「識字之人，有不讀經，無有不讀小說者」。[6]此種現象絕非區區律法就能令行禁止，也非道德訓誡所能力挽狂瀾，特別是在私人刻書風行和商品經濟發達的明清時期。

然而，在危機四伏、西學盛行的清季社會，受到新學影響、力主文化改造的啓蒙人士——他們主要是一批政治立場不盡相同的新知識分子、趨新士紳、開明官員、新式軍人等，受到世變之亟的刺激，意識到「今日法固不能不變，變法根本，端在讀書」。[7]而中國士民久處於專制政治之下，風氣閉塞，眼光狹隘，不關心國事，不具備國家思想，「目未睹凌虐之狀，耳未聞失權之事，故習焉安焉，以爲國之強弱，於己之榮辱無關，因視國事爲不切身之務云爾。」[8]且普遍迷信「怪力亂神」，「文明」程度非常低。在此情況下，啓蒙者開始將大眾閱讀文化視爲一個關係國家興亡的政治問題，[9]決心採用啓蒙論述來規訓老百姓的閱讀習慣，並借用西方這個象徵權威來背書，承續以往正統

4 余治，〈刪改淫書小說議〉，見余治，《重訂得一錄：各項善堂義舉規章》（上海：人文印書館，1934），卷 5，頁 46。

5 錢湘，〈續刻蕩寇志序〉，收入俞萬春，《蕩寇志》（上海：世界書局，1935），頁 4。

6 康有爲，〈《日本書目志》識語〉，收入姜義華主編，《康有爲全集》（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2），冊 3，頁 1212。

7 汪大鈞函，收入上海圖書館編，《汪康年師友書箚》（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6），冊 1，頁 595。

8 哀時客（梁啓超），〈愛國論一〉，原刊《清議報》（橫濱），冊 6（光緒二十三年十一月初六日），收入梁啓超，《飲冰室合集》（北京：中華書局，1989），文集之三，冊 1，頁 67。

9 十九世紀第二共和時期，法國改革者和政府也發起了一場改造民眾閱讀的運動，不許各個地方圖書館收藏有爭議作者的作品及一些異端的政治著作，希望能將有害於統治秩序的出版品包括一些文學讀物，從大眾的閱讀品中剔除出去。參見 Martyn Lyons, *Readers and Society in Nineteenth-Century France: Workers, Women, Peasants* (New York: Palgrave Macmillan, 2001), pp. 144-154.

的禁書論述，憑藉新的思想資源及傳播媒介，發起一場旨在改造大眾閱讀、禁止他們閱聽「淫辭小說」的論述與實踐。

在這個過程中，清末啓蒙人士時時以西方（包括日本在內）列強富國強兵的經驗（其中不少是他們想像的經驗）自警、警人，且將之轉化到小說、戲曲等文類中，去開導在他們看來是懵懂愚昧的「下流社會」，以為可以將己身的閱讀經驗、思維方式，順理成章地加之於他們，並以爲這是通往西方（包括日本）所示範的現代與建構民族國家的必須之路，「余謂各種系統之進於文明，皆非讀書不可」。[10]「地方上不讀書人太多，就為地方的大害。」[11]由是言之，引車賣漿者流閱讀什麼以及如何閱讀，必須適應啓蒙菁英的方略，服務於建立現代民族國家的需要。於此，閱讀已不再純是私人的行為，也不只是與人心風俗有關的行為，它實際關係到中國的國運和每個人的前途。筆者希望借此展開討論，就改造閱讀習慣的文化肇因，啓蒙人士採取的淨化策略與所獲得的效果，以及閱聽者的反應等方面，進行一些探討。

需要提醒的是，閱讀從不是在眞空狀態下進行，其過程和效果同文化習性、物質條件、傳播狀況等因素息息相關。至於這些因素的制約情形，本文限於材料和篇幅，不能一一處理，只能對傳統閱讀文化的影響、讀者的經濟基礎、傳播速度和廣度、讀者接收情況，以及編譯者與出版者層面進行一些考察。不過，中西學界對此已經有不少的研究，讀者可以參考。[12]

二、前現代中國閱讀習慣管窺

在中國，官方和知識菁英製造了大量的關於閱讀、禁書、禁止怪力亂神的

10　孫寶暄，《忘山廬日記》（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3），冊上，頁 622。

11　〈論地方上不讀書人太多，就為地方的大害〉，《通俗日報》（成都），宣統元年九月初六日，第 1 面。

12　參見李仁淵，〈閱讀史的課題與觀點：實踐、過程、效應〉，收入復旦大學歷史系、復旦大學中外現代化進程研究中心編，《新文化史與中國近代史研究》（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9），頁 213-254。筆者也有另文對此進行討論，可參見筆者待刊文〈物質、商業與傳播——五四新文化運動的社會化和地方化〉。

論述。在這些論述中，不少是針對下層百姓而言的，就是大量禁止他們閱讀某些通俗類文學書籍或閱聽戲曲，禁止他們迷信怪力亂神。其實，民眾接受和欣賞「怪力亂神」與「淫辭小說」，未必會一定走上同當權者和主流意識形態、禮儀綱常相對抗之路。然而，部份官方及正統人士，卻往往認爲，發布和推行禁令是應然之舉，再飾以冠冕堂皇的說辭，其目的無非還是爲了端正風俗人心、翼教衛道，維護專制王權的統治秩序與意識形態控制，預防這些文類惑世誣民，出現不樂見的後果。這些論述儘管大多是由官方或知識菁英製造，不足爲我們完全採信，但是，歷史上的下層民眾並沒有留下太多關於自己生活、閱讀、思想和信仰的記述——直接提供的證據太少，轉換視角，由這些官方論述出發，反其道而行，我們或亦能對前現代中國下層社會流行的閱讀文化有些許認識和體會。

實際上，那些官方和知識菁英屢禁不止的讀物，因其淺顯、通俗、富於趣味和故事性，且貼合一般民眾的生活及期望，往往是庶民百姓樂意閱聽的；而他們所推崇的教化、訓令，因其繁雜、艱澀，且常常帶有強迫性質，往往讓老百姓心存芥蒂、漠不關心。中國歷史上的下層民眾，他們的閱讀習慣以及思想的生成固然同官方和知識菁英的教化有關，但對於一般老百姓來說，他們的知識水準比較低，絕大多數人甚至不識字，日常的閱讀和娛樂興趣依然是稗官野史、聽大書、看戲劇等。這些文類以生動、形象化、扣人心弦的敘述，和寓意宏大、褒貶明確、發人浮想聯翩的修辭，展現人們對於人情世故、天道自然、善惡禍福、社會秩序、忠孝節義、禮教綱常的認知（包括服從、暌隔或反抗），實際昭示了他們的生活經驗、精神生活、期望及其如何面對、看待他們所處的外在環境。這些文類儘管有官方與正統意識形態不太認同的成份，但它們同時承載著正統教化，「內地各省城鄉彈唱稗官野史者流，如《三國志》、《說唐》、《說岳》之類，每逢鼓板登場，聽者塞座，驗其實效，雖事隔久遠，間涉荒唐，然無論婦孺皆知某也忠、某也奸，瞭若指掌。此習慣之可證者。」[13]民眾認知

---

[13] 〈程淯呈〉，收入故宮博物院明清檔案部編，《清末籌備立憲檔案史料》（北京：中華書局，

到的經史大義、綱常禮教、忠孝節義等正統意識形態，往往是經由小說、戲曲中生動形象的故事獲知，傳統小說與戲曲是呈現和傳達這些觀念的最佳方式，利用得當，足以佐助「文治」。

亦如以往研究所表明的那樣，一般來說，知識菁英甚至官方的直接影響力最多僅及於讀書識字階層，難以穿透至下層民眾的日常生活與行為當中，大眾關於過去的記憶以及對現世、來世的觀點和想像，通常是來自於他們從小到大就閱聽的民謠、神話、口述故事、戲劇以及傳統、通俗小說、小報、流行的出版品等文類，並非直接源自官方與知識菁英的訓誡。[14]對於前現代中國來言，可能更是如此，「今時一般社會所有種種思想及希望，大都皆發源於舊時各小說中者，居其十之七八。」[15]如魯迅在小說裏曾點出，某些人面對辛亥年間的亂象感慨：「倘若趙子龍在世，天下便不會亂到這地步了。」[16]教育家李廷翰(1886-1934)說，他小時候看了許多所謂「淫辭小說」，「後來作史論時，所發議論，覺得有益於小說者不少，而社會之情狀亦多於小說中得之。」[17]舒新城也在看了包括《三國演義》、《紅樓夢》、《西遊記》、《聊齋》、《西廂記》、《七俠五義》等小說之後自謂：「對於社會各方面的知識卻增長不少；文章也無形中進步了許多。而扶弱不依強，傲上不傲下的習慣，也大半由這些小說所養成。」後來舒新城說他不願意做官，也是因為受到小說《水滸傳》和《儒林外史》的影響。[18]張恨水喜愛風流才子、高人隱士的行為，鄙棄傳統的讀書做

1979），冊上，頁 280。

14 參見 Richard J. Evans, *In Defence of History* (London: Granta Books, 2000), p. 207.又可參見霍布斯鮑姆(Eric Hobsbawm)著，李金梅譯，《民族與民族主義》（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0），頁 56、90。

15 狄平子，〈小說新語〉，原見《小說時報》（上海），期 9，引文轉見陳平原、夏曉虹編，《二十世紀中國小說理論資料》（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1989），卷 1，頁 366。

16 魯迅，〈風波〉，收入魯迅先生紀念委員會編，《魯迅全集》（北京：人民文學出版社，1973），卷 1，頁 336。

17 李廷翰，《教育叢稿》（上海：中華書局，1921），第 5 種，頁 23。關於李廷翰，可參見許洪新，〈民國初教育家李廷翰史料鉤沉〉，收入林克主編，《上海研究論叢》（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7），輯 18，頁 319-332。

18 參見舒新城，《我和教育》（該書原為上海中華書局 1945 年版），收入張玉法、張瑞德主編，《中國現代自傳叢書》（台北：龍文出版社，1990），輯 2，冊上，頁 56、66。

官說法，也與他小時候受到舊小說的影響有關。[19]至於像三綱五常、《聖諭廣訓》之類教條，固然不斷灌輸老百姓，然多托諸空言說教，其效果如何，很成疑問，遠不如迂迴地經由通俗文類有成效。事實上，這類「肉食者謀之」的說教及閱讀規訓，或因其深文奧義，或以其形式繁雜，或由其陳義甚高，下等社會多不與之。

尤其就一般婦女而言，較喜歡感性的東西，「其於一切深文奧義索解而不能，於是寢饋於稗史小說」。[20]但這些書「不是說神仙鬼怪，就是說才子佳人」，[21]內容多爲不經之談，與傳統社會關於女性的倫理綱常時相悖反，不能不引起衛道翼教人士的擔憂，他們主張的女子教本無非還是一些承載正統教化的《女四書》、《女孝經》、《列女傳》之類書籍，以培養婦女的三從四德爲主義。[22]可是，這些讀物，「率迂陋不可卒讀」，[23]自然難引起婦女讀者的閱讀興致。因而，女子的閱讀世界根本不會像《女四書》中所言的——「淫佚之書不入門，邪僻之言不聞於耳」。[24]曾樸小說《孽海花》中有段話，雖屬小說家言，然還是能揭示一些女性讀者的閱讀情況：

> 這閨秀的姓名、籍貫，一時也記不得，但曉得他平日看見那些小說、盲詞、山歌、院本，說到狀元郎，好像個個貌比潘安，才如宋玉，常常心動。[25]

---

19 參見張恨水，《寫作生涯回憶》（北京：人民文學出版社，1982），頁 7。

20 董瑞椿，〈廣女學議〉，《實學報》（北京：中華書局，1991 年影印本），冊 6（光緒二十三年九月廿一日），頁 393。

21 裘毓芳，〈勸看白話報〉，《無錫白話報》（無錫），頁 5 下。該《無錫白話報》爲復旦大學圖書館館藏，無標注具體出版日期，其目錄與《中國近代期刊篇目匯錄》第 1 卷中的《無錫白話報》目錄不太一樣。《中國近代期刊篇目匯錄》第 1 卷中的《無錫白話報》目錄，沒有該期所有的《〈無錫白話報〉序》和這篇〈勸看白話報〉。參見上海圖書館編，《中國近代期刊篇目匯錄》（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80），卷 1，頁 922-925。

22 關於古代中國的女子教育及所使用教本，可參見祁伯文，〈中國女子教育之史的發展〉，《青年》（北平），卷 1 期 10、11（1938 年 11 月 1 日、11 月 15 日），頁 13-16、6-10。

23 劉師培，〈留別揚州人士書〉，收入萬仕國編著，《劉師培年譜》（揚州：廣陵書社，2003），頁 19。

24 王相箋注，《女四書》（上海復旦大學圖書館藏，光緒戊申年江陰源德堂藏版），卷下，〈女範〉，頁 49。

25 曾樸，《孽海花》，收入吳組緗等編，《中國近代(1840-1919)文學大系・小說集》（上海：上

可以說，僵化、枯燥的女教書無法滿足女性實際的閱讀需求，而像《西廂記》、《牡丹亭》這樣的言情傑作，卻讓許多女性愛不釋手、魂繫夢牽。難怪前現代社會一些以維護倫理綱常、移風易俗為己任的在地士大夫，要主動充當基層教化的先鋒和主力，配合地方官員，不遺餘力地查禁這類淫辭小說、規訓大眾文化和婦女。然而，不斷出現的女訓、女誡與官方或士大夫大量的整頓風俗的論說，以及被官紳們樹立的諸多貞女烈婦範型，只是顯示男權社會欲建構和期待的婦女形象，並不一定為普通婦女真心接受或效法。一些女性作家在作品中還大量涉及情欲問題，普遍出現的婦女燒香拜佛、卜問吉凶、「通姦」改嫁等「越軌」現象，在在是很好的證明。[26]

因此，一般情況下，大眾文化和女性的日常生活同正統的說教與規訓往往背道而馳，踏青、旅遊、觀戲、看小說、聽說書、唱山歌，迷信「怪力亂神」等，早已經成為大眾日常生活，特別是女性生活不可分割的部份。即便是較高階層和地位的婦女，由於種種原因，難得受到比較高級的文化教育及文化訓練，容易受到帶她們長大的保姆或僕人的影響，她們的閱讀和信仰依然是與下層社會婦女相似的。周作人在回憶母親時也曾提起：「先母不曾上過學，但是她能識字讀書。最初讀的也是些彈詞之類，我記得小時候有一個時期很佩服過左維明，便是從《天雨花》看來的……。」[27]周作人還記得他母親看《七劍十三俠》、《三國演義》、新出的章回小說之類的書。[28]民國期間亦類似，如出身破落豪門的張愛玲回憶她小時候，「我僅有的課外讀物是《西遊記》與少量的童話」。[29]在這些女性為人母後，此種喜閱小說的習慣又往往會影響到下一

海書店，1992），冊 4，頁 14。

26 高彥頤(Dorothy Ko)著，李志生譯，《閨塾師：明末清初江南的才女文化》（南京：江蘇人民出版社，2005）一書，其中也討論了明清時期，江南部份知識菁英女性的閱讀及文學創作，這部份女性讀者的閨中密枕中依然包含《牡丹亭》、《桃花扇》等「淫辭小說」，以及當時書籍市場上隨處可見的戲劇、小說和詩集等文類。對於前現代中國女性讀者的閱讀情況，還可參見 Li Yu, “A History of Reading in Late Imperial China, 1000-1800,” (Ph. D. dissertation, Department of East Asian Languages and Literatures, The Ohio State University, 2003), pp. 150-215.

27 周作人，《知堂回想錄》（香港：三育圖書公司，1980），頁 596。

28 周作人，《知堂回想錄》，頁 597。

29 張愛玲，〈天才夢〉(1939)，收入來鳳儀編，《張愛玲散文全編》（杭州：浙江文藝出版社，

代。李廷翰就回憶說：「我九歲時，始看小說。吾母爲我講解。」到他十一歲之時，已經讀了包括《水滸》等在內的一百多本小說。[30]

事實上，這類「淫佚之書」不只是文化程度不高的女子愛讀，就是一般的男性，也經常閱讀。狄楚青就認爲，不僅中國女子將《天雨花》、《筆生花》、《再生緣》等院本小說作爲教科書，「吾國舊時男子，何嘗不以小說爲教科書？」[31]如出版家、教育家舒新城回憶他在縣立高等小學求學時，「發現小說的一種寶藏，在那裏三年，除去前一兩個月外，無日不看小說」。[32]著名文學家包天笑也回憶，說他從小就愛看小說，「幾部中國舊小說，如《三國演義》、《水滸傳》、《東周列國》之類，卻翻來翻去，看過幾遍。後來還看《聊齋志異》、《閱微草堂筆記》這些專談鬼狐的作品。」[33]大概包天笑後來所以走上文學之路，與其小時候看這些「不正經」的書有很大關係。這種情況同樣發生在許多別的作家身上。1934 年，《文學》雜誌一周年紀念時，以「我與文學」爲題向作家們徵文，刊出白薇、錢歌川、徐懋庸、茅盾、艾蕪、巴金、歐陽山、趙家璧等 59 個作家的文章。這 59 人中，說到由讀經書走上文學路的只有 3 人，由唐宋古文或《莊子》、《文選》之類走上文學之途的，並無一人，大部份人都是因小時候看《三國演義》、《聊齋志異》、《西遊記》這類「誨淫誨盜」的說部，而走上文學之路的。[34]讀經書與喜好「淫辭小說」儘管未必相扞格，但顯而易見，較之經書，「淫辭小說」對於這些作家走上文學道路的影響

1995），頁 1。民初還曾有女子撰文告誡婦女不要有「耽於小說之惡習」，否則「其弊亦殊深」。參見丁婉宜，〈女子德性之修養〉，《中華婦女界》（上海），卷 2 期 3（1916 年 3 月 25 日），頁 9。這亦從反面坐實女性對於小說之喜愛。

30 李廷翰，《教育叢稿》，第 5 種，頁 23。

31 狄平子，〈小說新語〉，原見《小說時報》，期 9，引文轉見陳平原、夏曉虹編，《二十世紀中國小說理論資料》，卷 1，頁 366。

32 舒新城，《我和教育》，冊上，頁 25。

33 包天笑，《釧影樓回憶錄》（太原：山西古籍出版社、山西教育出版社，1999），冊上，頁 129。

34 參見曹聚仁，〈舊文人的文字遊戲〉，收入氏著，《曹聚仁雜文集》（北京：生活・讀書・新知三聯書店，1994），頁 42；鄭振鐸、傅東華編，《文學一周年紀念特輯：我與文學》（上海：生活書店，1934）。

要大的多。而一些鄉間的塾師，固然是正統文化、菁英文化的代言人和宣講者，但他們同時也充當了「淫辭小說」的保存者與傳播者的角色。正像舒新城的回憶，說他們村子（湖南溆浦鄉下）裏的人，「對於先生尤其重視：每到年節，大家都要請他去吃飯，平常到了吃過夜飯的時候，先生的房間或者佛堂的天井中，總是坐著許多本鄉的老人和少年，圍著先生聽他講《說唐》、講《水滸》、講《三國演義》、講《包公案》、講《蕩寇志》，以及其他的種種故事。」[35]

上述的種種情況，均足以表明「淫辭小說」類讀物受歡迎的程度。故有人總結道：「下流社會中，雖不能讀經史等書，未有不能讀小說者；即有不讀小說，未有不知小說中著名之故事者。」[36]進而言之，這些「淫辭小說」類讀物並非只有引車賣漿者流、婦女或孩童喜歡閱讀，即或是士大夫、達官貴人也分享這些文類和此種閱讀文化傳統，階級或財富並不構成阻隔大眾文化和菁英文化的鴻溝，貌似大相徑庭的大眾文化和菁英文化，其相通、相融處通過閱讀相同的「淫辭小說」亦表現出來。1442 年（明正統七年），曾有朝臣主張禁止《剪燈新話》等小說，其原因就是：「不惟市井浮誇之徒，爭相頌習，至於經生儒士，多舍正學不講，日夜記憶，以資談論。若不嚴禁，恐邪說異端，日新月盛，惑亂人心。」[37]個別高級官員曾在應對雍正問答時，援引三國舊事，無意識中流露出曾讀過《三國志》小說，還爲此遭到治罪。[38]凡此，均可見這些文類之吸引力與影響力：

> 社會間其文字知識稍深的，莫不有一部《三國志》、《水滸》、《西遊》、《封神》、《七俠五劍》、《紅樓夢》等書在其胸中；其知識稍下的，莫不有《十八摹》、《哭五更》、《四季相思》、《瓦車蓬》、《五美圖》等為其吟諷；其全無知識的，則工作勞苦的餘暇，亦莫不藉一二山歌俚語，以發抒心志。此等著作與口耳朝夕相接，觀念為其

35 舒新城，《我和教育》，冊上，頁 25。

36 〈論小說之教育〉，《新世界小說社報》，期 4，引文轉見陳平原、夏曉虹編，《二十世紀中國小說理論資料》，頁 186-187。

37 〈正統七年禁《剪燈新話》等小說〉，收入《元明清三代禁毀小說戲曲史料》，頁 15。

38 〈雍正六年二月郎坤援引小說陳奏革職〉，收入《元明清三代禁毀小說戲曲史料》，頁 36。

所移，行為為其所化。[39]

約言之，一般大眾熱中於接受和閱讀的毋寧是那些「怪力亂神」、「淫辭小說」，而非冠冕堂皇的意識形態教條。長期在這些通俗文類的耳濡目染下，一般人不知不覺中受到潛移默化，「而天下之人心風俗，遂不免爲說部之所持」。[40]

正是看到「說部」影響民眾思維世界甚巨，梁啓超才號召：「今宜專用俚語，廣著群書，上之可以借闡聖教，下之可以雜述史事，近之可以激發國恥，遠之可以旁及彝情，乃至宦途醜態、試場惡趣、鴉片頑癖、纏足虐刑，皆可窮極異形，振厲末俗，其爲補益，豈有量耶！」[41]換言之，從把持庶民大眾的「說部」入手，就成爲改造閱讀習慣的必然途徑。而戲劇爲小說中一部份，劇本大多由小說改變而來，有新小說而後有新劇本，則小說之改良，尤爲首要。[42]

在十九世紀末葉以前，不管是中央政府、地方政府，或是在地的士大夫，他們雖都主張禁止老百姓讀這些「淫辭小說」，個別有遠見之人如錢湘，也認識到要找出如《蕩寇志》之類的替代讀物，才能達到不僅禁售者、亦並使閱者不取閱「誨淫誨盜」這類書的目的——「茲則並其心而禁之，此不禁之禁，正所以嚴其禁耳」。[43]可有錢湘這樣見識的人在當時實屬鳳毛麟角，他們並沒有製作出多少像俞萬春的《蕩寇志》這樣高品質的維護「封建」綱常倫理的讀物，以代替那些所謂淫辭小說。一般士人能做的，無非是表率禁書、宣揚綱常禮教、因果報應、送善書和主張改刪而已。

十九世紀末之後，禁「誨淫誨盜」這類書的論述從中央到各級政府，乃至於士人階層，依舊有不少表述，出發點也與之前相同。甚至是當時的新學才子梁啓超，亦有相同認知：「中土小說，雖列之於九流，然自《虞初》以來，佳

39 畸零，〈小說與社會〉，《大公報》（長沙），1919 年 8 月 28 日，第 2 張。

40 〈本館附印說部緣起〉，《國聞報》，期 1（光緒二十三年十一月十八日），轉見張靜廬輯注，《中國近現代出版史料・補編》（上海：上海書店，2003），頁 103。

41 梁啓超，〈變法通議・論幼學〉，原刊《時務報》（上海），冊 16（光緒二十二年十二月初一日），收入《飲冰室合集》，文集之一，冊 1，頁 54。

42 參見棣，〈改良劇本與改良小說關係於社會重輕〉，《中外小說林》，卷 2 期 2，引文轉見陳平原、夏曉虹編，《二十世紀中國小說理論資料》，頁 294-295。

43 錢湘，〈續刻蕩寇志序〉，收入《蕩寇志》，頁 4。

制蓋鮮。述英雄則規畫《水滸》，道男女則步武《紅樓》。綜其大較，不出誨淫誨盜兩端。」[44]在梁啓超稍早的〈變法通議．論幼學〉一文中，梁亦曾說中國古代文人之文「誨淫誨盜，不出兩端。故天下之風氣，魚爛於此間而莫或知，非細故也。」[45]不同的是，在梁啓超發表這類言論的時代，特別是由於庚子年義和團事件，怪力亂神由異端進入正統，許多士人相信「神權」，認爲洋人船堅炮利不足畏，拳民皆可以術破之，其結果自然是眾所周知。

隨著西學的不斷湧入，特別是在義和團事件發生之後，啓蒙人士鑒於庚子之後的現實困境，開始群起反思義和團事件之文化造因，他們認爲義和團的興起是與傳統通俗文學的影響分不開的。有人乾脆指出：「庚子之拳匪，即《封神演義》一書之結胎也，可見稗官野史實與政俗上有直接之關係。」[46]「拳匪神壇，所奉梨山聖母、孫悟空等，皆劇中常見者。愚民迷信神權，演此劫運，蓋醞釀百年以來矣。」[47]的確，義和團的組織形式、聚集方式很多是從他們耳熟能詳的通俗文學中而得，團眾將這些文化習得運用於自己所從事的活動中，之所以如此，「大約此輩人胸中只有《封神演義》、《西遊記》、《水滸傳》數部書耳。其餘無非戲文搬演之經驗。」[48]啓蒙人士反思義和團運動的根源，認識到正是因爲北方老百姓相信與模仿《封神傳》、《西遊記》之類「邪書」中的描述，認爲自己法力無邊、刀槍不入，才敢起來與洋人爲難。

痛苦反省義和團運動的文化起源之餘，這些啓蒙士人也認識到這樣一個現實：《封神傳》、《西遊記》等書之所以爲下層社會之聖經；觀世音、姜太公

---

44 任公（梁啓超），〈譯印政治小說序〉，原刊《清議報》（橫濱），冊 1（孔子二千四百四十九年十一月十一日），收入《飲冰室合集》，文集之三，冊 1，頁 34。這種評價有故作高論之嫌，並不意味著任公不讀這些「誨淫誨盜」的舊小說。因梁曾自道：「吾讀《水滸傳》，宋公明何以破祝莊；吾讀《西遊記》，唐三藏何以到西域……。」見梁啓超，〈過渡時代論〉，原刊《清議報》（橫濱），冊 83（孔子二千四百五十二年五月十一日），《飲冰室合集》，文集之六，冊 1，頁 29。

45 梁啓超，〈變法通議．論幼學〉，收入氏著，《飲冰室合集》，文集之一，冊 1，頁 54。

46 津門清醒居士，〈開民智法〉，《大公報》（天津），1902 年 7 月 21 日，未標版面。

47 羅惇融，《庚子國變記》（上海：上海書店出版社，1982），頁 14。

48 〈某人致某人函〉，轉見中國社會科學院近代史研究所編，《義和團史料》（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1982），冊上，頁 255。

之流，之所以爲下層社會之教主，正在於下層社會「其智識極短，其生計極難，其道德極淺薄，其社會極渙散。」[49]在這樣的情形下，必須對下層社會應該讀什麼書進行規訓，「若近時之義和團，則《封神傳》、《西遊記》產出之人物也。故欲改進其一國之人心者，必先改進其能教導一國人心之書始。」[50]

然清廷對內憂外患已疲於應付，在查禁「淫辭小說」方面實是有心無力。此消彼長，憑藉新的思想資源和傳播媒體崛起的啓蒙人士，則成爲禁「淫辭小說」這類書的主角。自然，這也決非意味著清朝各級政府以及翼教衛道之士對「誨淫誨盜」這些文類撒手不管、不聞不問，只是說在當時出現的各種有關論述中，與借助於新式傳播媒體和出版機構以「開民智」的啓蒙論述相比，這些議論顯得有些舊調重彈、了無新意。如其時尚爲清政府辯護者之《申報》的言論：書之當禁者有二，一爲誨盜誨淫之小說；一爲訕謗朝廷之謬書。[51]相較於《申報》這樣的衛道立場，啓蒙人士不只提出了要查禁「誨淫誨盜」這類書，更要尋找和製作出這類書籍的替代讀物——新小說、文明戲，從理論和實踐上眞正改造民眾的閱讀。且他們對於應該禁止「訕謗朝廷之謬書」的主張，大都不以爲然，甚至斥之爲「野蠻之舉動」，有悖進化公例。

不過，禁書乃老生常談，早已數見不鮮。且從以往查禁效果來說，收效不大，經常會適得其反，在清末新式傳播媒體大量出現的情況下，還會招致輿論抨擊，反倒爲被禁的閱讀品做了廣告，愈禁愈增加其份量和銷量。禁止閱讀顯然不能正本清源，要想不讓大眾閱讀某些書，就必須預備相應的讀物代替，否則效果不會很大。解鈴還須繫鈴人，製造出合適的替代品，吸引讀者的閱讀興趣，這才是「不禁之禁」之道。「文本只有通過讀者才具有意義，且會隨讀者而變化。」[52]沒有讀者的閱讀，新的文類生產再多又有何用？

49 〈論革除迷信鬼神之法〉，《中外日報》（上海），1905 年 4 月 9 日，第 1 版。

50 觀雲，〈神話歷史養成之人物〉，《新民叢報》（橫濱），號 36（光緒二十九年六月十四日），頁 88-89。

51 〈論公堂嚴辦發售《警世鐘》事〉，《申報》（上海），1905 年 1 月 7 日，未標版面。

52 Michel de Certeau, *The Practice of Everday Life* (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1988), p. 169.

三、改造閱讀習慣之主要舉措

對已經吸納新思想資源的啓蒙者而言，小說所關甚大，「國勢由於風俗，風俗由於民德，民德由於所讀之書，書以小說爲能普及，此已論定，無可疑矣，不必贅矣。」[53]考究日本明治維新之成功，小說亦有大功，但相比起來，中國「小說界之腐壞，至今日而極矣。夫小說爲振民智之一巨端，立意既歧，則爲害深，是不可不知也。」[54]梁啓超之生花妙筆更是將「吾中國群治腐敗之總根源」歸咎爲舊小說，[55]並大力疾呼：

> 欲新一國之民，不可不先新一國之小說。故欲新道德，必新小說；欲新宗教，必新小說；欲新政治，必新小說；欲新風俗，必新小說；欲新學藝，必新小說；乃至欲新人心、欲新人格，必新小說。何以故？小說有不可思議之力支配人道故。[56]

於此，小說的社會功能與政治作用得到了前所未有的認識和強調，梁啓超在介紹新創辦的《新小說》時也標榜：「蓋今日提倡小說之目的，務以振國民精神、開國民智識，非前此誨盜誨淫諸作可比。」[57]而他主辦的《新小說》雜誌則想爲中國的說部「創一新境界」，宗旨在於「借小說家言，以發起國民政治思想，激勵其愛國精神。一切淫猥鄙野之言，有傷德育者，在所必擯。」[58]梁啓超這

53 〈說小說〉，《中外日報》（上海），1902 年 4 月 10 日，第 1 版。

54 衡南劫火仙，〈小說之勢力〉，原刊《清議報》，冊 68，引文轉見陳平原、夏曉虹編，《二十世紀中國小說理論資料》，頁 32。

55 梁啓超的這種觀點後來遭到「曼殊」的反駁：「今之痛恨祖國社會之腐敗者，每歸罪於吾國無佳小說。其果今之惡社會爲劣小說之果乎？抑劣社會爲惡小說之因乎？」曼殊，〈小說叢話〉，《新小說》（上海），號 13（光緒三十一年元月），頁 172-173。不過，後來還是有不少人的觀點與梁啓超此處的認知契合，民國初年一作者即發表過類似高論，「吾國數千年專制黑暗之歷史、盜賊淫亂之社會，雖皆謂小說有以致之可也。」徐章埒，〈論小說與社會之關係〉，《友聲》（杭州），期 1（1913 年 8 月），頁 10-11。

56 梁啓超，〈論小說與群治之關係〉，《新小說》（橫濱），號 1（光緒二十八年十月十五日），頁 1。

57 〈紹介新刊：《新小說》第 1 號〉，《新民叢報》（橫濱），號 20（光緒二十八年十月十五日），頁 99。

58 〈中國唯一之文學報《新小說》〉，《新民叢報》（橫濱），號 14（光緒二十八年七月十五

些關於新小說社會功能的論述得到了當時諸多人士之支持，他們紛紛在報章雜誌上發表論述呼應。[59]

在「小說爲改良社會之不二法門」的呼籲下，許多小說類刊物紛紛創辦，「自《新小說》出，而復有《新新小說》踵起，今復有《小說林》之設。故滬濱所發行者，前後不下數百種。」[60]同時，報紙、雜誌上也開始有大量新小說廣告出現，梁啓超、李伯元等人創作的新小說都曾被出版商作爲品牌推出。林紓的翻譯小說以及一些翻譯日本的小說如《經國美談》、《廣長舌》之類廣告，亦經常可在當時報章雜誌上見到。創作、翻譯新小說已經成爲新的文化產業，「今者，有志之士爭以譯小說、編小說爲急務，廣告所布，日出不窮。」[61]政治小說、立憲小說、國民小說、偵探小說、翻譯小說、倫理小說、心理小說、寫情小說、歷史小說、教育小說、科學小說、哲學小說、冒險小說、寓言小說、語怪小說、家庭小說、苦情小說、虛無黨小說、復仇小說、時事戲劇、歷史新戲、廣東戲本等，名目花樣百出，其中尤以翻譯小說最爲盛行。

此時諸多報紙、雜誌也已開始刊載或連載小說，新小說的生產供不應求。那些專門的小說雜誌社，四處募集新小說著作，宣稱想「藉稗官野史之勢力，爲開智革俗之津梁」。[62]一般的報紙、雜誌還對新著、新譯小說許以重酬。像《新小說叢報》社的小說徵集酬金爲甲等洋五元，乙等四元，丙等三元，丁等二元。[63]《時報》社提供的小說酬金更高，第一等甚至達到千字十元，二等七元，三等也有五元。[64]《小說世界日報》的求新奇小說的徵文廣告中，亦以每種十元至百元計酬，但所作小說「須與本社宗旨符合而有益於社會」。[65]諸如

日），插頁。此文原未署名，應出自梁啓超之手。

59 這方面的論說可以參見陳平原、夏曉虹，《二十世紀中國小說理論資料》；還可參見張仲民，〈清末報刊上改良小說和戲曲論述篇目(1900-1911)〉，收入《新文化史與中國近代史研究》，頁 442-452。

60 〈小說叢話〉定一語，《新小說》（上海），號 15（光緒三十一年三月），頁 169。

61 〈說小說〉，《中外日報》（上海），1902 年 4 月 10 日，第 1 版。

62 〈改良小說社徵求小說廣告〉，《時報》（上海），1909 年 6 月 28 日，廣告第 3 張。

63 〈徵求小說〉，《時報》（上海），1906 年 9 月 9 日，首頁廣告。

64 〈小說大懸賞〉，《時報》（上海），1907 年 4 月 18 日，第 1 張。

65 「《小說世界日報》」廣告，《新聞報》（上海），1905 年 4 月 9 日，第 1 張。

包天笑此類困於科場的才子，就是靠翻譯和寫作新小說掙稿費謀生，漸而在上海洋場出人頭地的。[66]後來，連一向並不刊載小說的《中外日報》，也以翻譯小說「益人智慧不少」，開始請人專門翻譯新小說，並按日刊登。[67]隨後又開始連載一些中國人自己撰寫的新小說。[68]1905 年 4 月，改版後趨新的《申報》，也多次刊登出了「訪求小說」的廣告。號稱以啓蒙爲職志的《大公報》則有些姍姍來遲，直到 1909 年 2 月下旬才開始刊載小說，其根據也是本著「社會教育之中，尤以小說之功居多」的原則。[69]一直在連載新小說的《神州日報》，亦因其所刊載的「譯著各小說，久荷海內稱許，良由稗官家言最足增進智識，開通社會也」，多次刊出《訪求小說》告白：「不吝重酬」，訪求「新著新譯各小說，無論章回傳記、彈詞曲本」。《新聞報》則在刊登的小說之前，先在每日報紙上作「本報附載小說」預報給讀者。商務印書館則徵求過反迷信的小說：「述風水算命燒香求籤及一切禁忌厭勝之事，形容其愚惑，以發明格致眞理爲主……。」[70]

在報刊的讀者當中，許多人喜歡讀的也是報刊上所刊登之小說，特別是知識水準較低的「婦女與粗人」類讀者。故此就有人主張以書報專攻士大夫，小說「專攻婦人與下等人」。[71]「惟婦女與粗人，無書可讀，欲求輸入文化，除小說更無他途。」[72]因之，這時報紙的銷路都與小說大有關係，爲利潤計，絕大多數報章雜誌也刊登新小說，以吸引讀者目光，增加發行量。曾親與其役的包天笑回憶說：

> 那時候，正是上海漸漸盛行小說的當兒，讀者頗能知所選擇，小說與報紙的銷路大有關係，往往一種情節曲折，文筆優美的小說，可以抓

---

66 可參見李仁淵，〈新式出版業與知識份子：以包天笑的早期生涯爲例〉，《思與言》（台北），卷 43 期 3（2005 年 9 月），頁 53-104。

67 《中外日報》（上海），1906 年 2 月 2 日，第 1 版。

68 〈添印新著小說啓〉，《中外日報》（上海），1907 年 5 月 9 日，第 1 版。

69 〈本報增刊小說廣告〉，《大公報》（天津），1909 年 2 月 18 日，第 2 版。

70 〈上海商務印書館徵文〉，《新聞報》（上海），1904 年 12 月 4 日，廣告版。

71 〈說小說〉，《中外日報》（上海），1902 年 4 月 10 日，第 1 版。

72 別士（夏曾佑），〈小說原理〉，《繡像小說》（上海），期 3（癸卯閏五月初一日），頁 4。

住了報紙的讀者。[73]

胡適經驗或可為包語的注腳。那時正在上海求學的胡適後來回憶說：「我在上海住了六年，幾乎沒有一天不看《時報》的。」他認為當時《時報》之所以受歡迎，原因之一即在於：「那時的幾個大報大概都是很乾燥枯寂的，他們至多不過能做一兩篇合於古文義法的長篇論說罷了。《時報》問世以後每日登載『冷』（即陳景韓）或『笑』（即包天笑）譯著的小說，有時每日有兩種冷血先生的白話小說，在當時譯界中確要算很好的譯筆。他有時自己也做一兩篇短篇小說，如〈福爾摩斯來華偵探案〉等。」[74]年少的胡適讀小說上癮，他有時不禁見獵心喜，自己也寫小說，投稿《時報》（或即投稿《時報》「小說大懸賞」）。胡適還回憶當時《時報》刊載的許多小說之中，哀情小說《雙淚碑》最為風行。有別的讀者在讀了《雙淚碑》後投書《時報》，表達自己的閱讀感受，也為胡適的說法提供了證明，「余讀此，余心碎，余腸斷，余膽戰，余淚枯，余腦筋覺有萬千之刺激，余魂已飄飄，若離余之軀殼……。」[75]而讓小胡適等讀者神魂顛倒的「哀情小說」《雙淚碑》，只是《時報》重金懸賞小說中的第二等。[76]該小說後來還曾單獨成書出版，以滿足讀者需要，定價僅時洋一角。[77]

這時，有的報刊為吸引讀者、增加銷量，還採用不另收費、隨報紙附送小說的手段（當然也有如《申報》等附送《點石齋畫報》，《大公報》附送白話論說的情況），如歷史悠久之《申報》即刊載廣告曰：將新聞小說、各處風景擇其有趣味者，繪成畫圖報一大張，按日石印附送，以答閱報諸君期望之厚意。[78]還有的小說雜誌如《小說時報》，因為出版後讀者日多，使成本下降，從而降價銷售，以刺激讀者的購買欲望。[79]廣智書局則採取捆綁銷售策略，凡

73 包天笑，《釧影樓回憶錄》，冊上，頁 407。

74 胡適，〈十七年的回顧〉，見鄭大華整理，《胡適全集》（合肥：安徽教育出版社，2003），冊 2，頁 403-408。

75 〈投書〉，《時報》（上海），1907 年 7 月 28 日，第 5 張。

76 〈雙淚碑〉，《時報》（上海），1907 年 6 月 11 日，第 1 張。

77 〈各種新小說〉，《時報》（上海），1908 年 7 月 16 日，首頁廣告。

78 「本館特別廣告」，《申報》（上海），1909 年 12 月 11 日，第 1 張第 3 版。

79 〈《小說時報》減價原因〉，《時報》（上海），1909 年 11 月 27 日，廣告第 3 張。

購買該書局書籍一元以上者，送新小說一冊，購買書籍兩元以上者送兩冊，以此類推，十元以上送十冊，並在報紙廣告上開列出所送的十三種新小說書目，以吸引讀者。[80]改良小說社則大作廣告，說購買該社出版的新小說超過一元者有贈書相送。[81]甚至賣騙人藥艾羅補腦汁的中法大藥房，在賣藥品時也附送新小說以促銷。[82]有的報刊還搭便車，拿《水滸》、《封神演義》等在民間極流行之類小說做文章，推出《新水滸》、《英雄小說新水滸》、《新封神傳》、《新西遊記》、《也是西遊記》、《新聊齋》、《反聊齋》、《改良版聊齋志異》、《新儒林外史》、《新石頭記》等名目的小說，將舊題目賦予新內容，以此增加賣點，吸引讀者購買。如此種種，不一而足。這些做法從客觀上都會影響讀者的閱讀選擇，也說明新小說在當時所造成的社會效應。後來許多小說雜誌雖因種種原因而停刊，可「華人愛讀新小說之嗜好，乃經久而益盛」。[83]難怪有人感慨：「近年譯籍東流，學術西化，其最歆動吾新舊社會，而無有文野智愚咸歡迎之者，非近年所行之新小說哉！」[84]

以上這些著譯小說的實際內容、著譯動機和出版旨趣千差萬別，但在名義上它們往往都援用了「改革小說」、「新小說」、「新新小說」之類廣泛流行於啓蒙人士間和報刊中的符號，多將小說與國家、與啓蒙聯繫起來，所謂「出一小說必自尸國民進化之功，評一小說必大倡謠俗改良之恉，吠聲四應」，「雖謂吾國今日之文明爲小說之文明可也」。[85]提倡改良小說之勢，轉眼風行草偃，「不數年而吾國之新著新譯之小說，幾於汗萬牛、充萬棟，猶復日出不已而未有窮期也。」[86]十餘年前的八股世界，「近則忽變爲小說世界」。[87]這當中，

80 「奉送小說」，《時報》（上海），1907 年 4 月 13 日，首頁廣告。
81 〈閱新小說者又有特別贈品〉，《民立報》（上海），1911 年 7 月 21 日，第 1 頁。
82 〈謹送新小說保證書〉，《時報》（上海），1905 年 2 月 19 日，第 1 張第 5 頁。
83 〈論泰西書籍流通中國〉，《中外日報》（上海），1908 年 3 月 22 日，第 1 版。
84 覺我，〈《小說林》緣起〉，《小說林》（上海），期 1（光緒三十三年六月再版），頁 1。
85 摩西，〈《小說林》發刊詞〉，《小說林》（上海），期 1，頁 3、2。
86 吳沃堯，〈《月月小說》序〉，《月月小說》（上海），卷 1 號 1（光緒三十二年九月望日），頁 2-3。
87 寅半生，〈《小說閑評》敘〉，《遊戲世界》，期 1，引文轉見陳平原、夏曉虹編，《二十世紀中國小說理論資料》，頁 182。

眞心鼓吹者有之，隨聲附和、渾水摸魚實行「拜金主義」者亦比比皆是。由於文化市場上存在許多粗製濫造的新小說，一般讀者購閱起來可能會無從下手。於是，一些幫助讀者購買小說、批評舊小說的指南書如《小說閑評》之類書，也開始應時而生；一些「購書宜慎」、「新書評騭」與抨擊新小說品質之差的告白或文章亦開始出現在當時的報刊中。凡此，均足表明新小說論述的符號威力及時人之心態。當時的小說家陸士諤曾用諷刺的筆法描述了時人對新小說的看法，以及新小說發揮的作用：

> ……我們瞧了這些新小說，差不多增進了數十年的閱歷，所以在社會上交際，人家的圈套，頗能識破他一二，決不會再受人欺騙了。……新小說乃是人人少不來的東西，差不多與吃飯穿衣一般的緊要。……新小說不僅有益於人的知識，並還有益於人的身子呢！[88]

關於清末新小說的生產情況，時人曾言不下一二千種，[89]後有學者做過比較詳細的統計，[90]缺漏之處自然難免，但足可表明清末新小說創作之繁盛。

在前現代中國總體識字率很低的情況下，所謂「中國識字之人十一，讀書之人百一，閱報之人千一」。[91]小說固然能吸引下層社會的讀者，「然能閱小說者，仍限於識字之人，且必識字而粗解文理，略諳世事之人，始能有所領悟，而生其感觸之思想。」[92]即或是設立講演新小說所這類組織，收效也有限，況且新小說的讀者還須具有一定的文學修養與審美能力。換言之，新小說的直接影響力一般也只能觸及讀書識字階層，這些人在中國社會中只能占少數，就是

---

88 陸士諤，《新上海》（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7），頁 39-40。

89 新，〈新小說之平議〉，《漢口中西報》，1909 年 4 月 23 日，新聞第 1 頁。

90 參見樽本照雄，《新編增補清末民初小說目錄》（濟南：齊魯書社，2002）；劉永文，《晚清小說目錄》（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8）。

91 高鳳謙函，收入《汪康年師友書劄》，冊 2，頁 1623。羅有枝(Evelyn Sakakida Rawski)曾引用多種材料來估算中國十九世紀時的識字率，她認爲男女平均識字率在當時大約爲 16-20%。參見 Evelyn Sakakida Rawski, *Education and Popular Literacy in Ch'ing China* (Ann Arbor: The University of Michigan Press, 1979). 但羅有枝的估算頗值得商榷，包括對識字率的定義，對於相關數字的推演等。參見張朋園，〈勞著《清代教育及大眾識字能力》〉，《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集刊》，期 9（1980 年 7 月），頁 455-462。

92 〈論演說之效果〉，《中外日報》（上海），1905 年 5 月 20 日，第 1 版。

閱讀新小說者以言傳身教去感化周圍之人，新小說之普及率與發揮的效力終歸有限，靠新小說來改造絕大多數中國人的閱讀習慣，無疑仍是短綆汲深。相較起來，小說之受人歡迎就遠不逮戲劇了，「小說雖作至極淺，終不能入不識字人之目。必待由小說而化爲戲劇，其用乃神。」[93]啓蒙人士認爲，如能成功剔除舊戲曲中的腐朽成分而編纂出新劇，勢必會達到良好效果。

要之，對於絕大多數不識字之人，包括部份讀書識字者，不能無所娛樂，看戲仍是他們娛樂即「閱讀」的主要手段。而從本質及閱讀效果看，我們不應該將閱讀的形式僅侷限於閱讀書籍和報刊等紙類媒介，閱讀活動的參與者決非只限於印刷符號的讀者，看電影、看電視、上網都是閱讀的形式。同樣，閱讀不應只侷限於眼睛，戲曲、大書就是文盲的書籍，聽讀書、聽戲等以耳朵爲主的活動一樣也是閱讀的形式。[94]如羅伯・丹屯(Robert Darnton)之言：「閱讀一個儀式或一個城市，和閱讀一則民間故事或一部哲學文本，並沒有兩樣。」[95]從這種闡釋人類學角度，自可說，閱讀小說和閱聽戲劇並無差異。戲劇本多來自於說部稗史，是從中演化出的一種藝術形式，就文類性質而言，二者毫無軒輊。從閱讀的效果來言，參與文化的傳播也絕非只有通過印刷文字才能實現，對於前現代的中國下層民眾來說，口耳相傳才是他們交流資訊的主要手段，閱聽戲曲對下層民眾文化的重要，不亞於印刷文本之於菁英文化，「蓋戲館者，儼然一下流社會之活動學校也；戲本者，儼然一下流社會之教科新書也。」[96]這就很容易理解，爲什麼清代北京城的餑頭鋪，爭相兼營出租唱本給買餑頭的人，這些唱本的內容無非還是所謂「淫辭小說」，故能吸引大量閱聽人。[97]

---

93 〈論興學練兵作小說，其效不及演戲之速〉，《中外日報》（上海），1903 年 11 月 15 日，第 1 版。

94 Guglielmo Cavallo, Roger Chartier, eds., *A History of Reading in the West*, trans. Lydia G. Cochrane (Amherst & Boston: University of Massachusetts Press, 1999), p. 4; Roger Chartier, *The Order of Books: Readers, Authors and Libraries in Europe Between the Fourteenth and Eighteenth Centuries*, trans. Lydia G. Cochrane (Cambridge: Polity Press, 1994), pp. 8-9.

95 羅伯・丹屯(Robert Darnton)著，國立編譯館主譯，呂健忠譯，《貓大屠殺：法國文化史鉤沉》（台北：國立編譯館、聯經出版事業股份有限公司，2005），頁 xii。

96 張蔚臣，〈開民智莫善於演戲說〉，《大公報》（天津），1906 年 11 月 5 日，第 2 張。

97 李家瑞，〈清代北京餑頭鋪租賃唱本的概況〉，收入張靜廬編，《中國近現代出版史料・補編》，

實際上，看戲之類的「閱讀」不只流行於下層社會，它在中上層社會和士大夫之中同樣廣泛流行，「上而王公，下而婦孺，無不以觀劇爲樂事」。[98]乾隆、光緒和慈禧就是清代統治者中最愛看戲的代表，清代宮廷裏演戲非常頻繁，內廷還設置專門的演劇機構南府和昇平署，在宮廷內外以及各處行宮，修建了眾多的戲臺；同時也大量傳喚市井戲班入宮演戲，慈禧統治時期，內廷傳旨演劇，「一月之中，傳演多至數次」。[99]京劇的崛起就與滿清皇族的喜愛和提倡有關。民間因醮會、盂蘭盆會、賽龍舟、婚喪嫁娶、拜神祭祖等事情而演戲的情況自是非常普遍。在這些廣泛流傳的戲曲中，內容屬於忠孝節義、因果報應之類的戲非常流行，所謂淫戲更是極受歡迎。

演戲以其更形象化、更直接、更便捷的手段娛樂觀眾，自然會感染不少閱聽人。文康在《兒女英雄傳》中曾以文學家的筆法惟妙惟肖地形容了聽戲人的神情：

> 瞧了瞧那些聽戲的，也有那咂嘴兒的，也有點頭兒的，還有那從丹田裏運氣，往外叫好兒的，還有幾個側耳不錯眼珠兒的，當一樁正經事在那兒聽的。看他們那些樣子，比那書上說的聞《詩》聞《禮》還聽得入神兒。[100]

此雖爲小說家語，但亦可證戲曲對於老百姓的吸引力，遠非正統說教可比擬。故當時有啓蒙人士即言：「最足震動冥頑之腦筋者，不在眞事之歷史的，而在假面狀之戲曲的。」[101]聽大書也是下層社會常見的消閒或閱讀方式，尤其是在鄉村。在大書的閱聽者中，「聽書的人不好聽勸善懲惡的箴言，專好聽佳人才子的情語，殺人放火的野蠻史和鬼怪神奇的荒唐小說。」講大書的人也投其所

頁 134-138。

98 箸夫，〈論開智普及之法首以改良戲本爲先〉，《之罘報》（煙台），期 7（光緒三十一年四月十一日），頁 3。

99 飄瓦，〈京華聞見錄〉，收入蘇曼殊等著，《民權素筆記薈萃》（太原：山西古籍出版社，1997），頁 140。

100 文康，《兒女英雄傳》（北京：十月文藝出版社，1995），頁 246。

101 榆，〈論改革習俗之難〉（續），《盛京時報》（瀋陽），光緒三十四年六月十二日，第 2 張。

好，不講枯燥的道德說教，「所說的不是偷香私會的淫蕩事，就是綠林的傳奇和神怪的說部。」[102]在內容與效果上，聽大書與觀戲實是殊途同歸。

戲曲既有如此力量，影響世道人心自是巨大，有人甚至認爲，凡是一切民間怪力亂神類的東西都是依託於戲曲才發揮力量的，「凡五星（行）陰陽之說，僧道元虛之談，鬼祟狐疑之惑，若無戲曲徵信之，則毫無勢力之足言。」他認爲欲從根本上改革這種現狀，「非掃除神話鬼怪迷信之惡劇，改編崇尚忠賢有益世風之新戲。」[103]類似觀點與心態，盛行於啓蒙人士中，他們普遍意識到，戲劇爲改良社會風氣、促進啓蒙的妙藥，「欲無老無幼無上無下，人人能有國家思想而受其感化力者，舍戲劇末由。」[104]特別是對於下層人士，他們不識字，不讀新書，也買不起新書、新報，僅僅依靠新書、新報來開通智慧就收效甚微，反觀於戲曲對於「下流社會」的影響，則不可同日而語：

> 試觀窮鄉僻壤，報賽競會、袍笏登場，萬眾無嘩，村婦牧豎，蠢男野老，每當演至古忠臣烈士、貞女義僕，殉節遭難、酸心慘目之際，往往聲咽淚落。抑或演古奸雄淫娃、賣友惡奴、負心背德，明謀陷害之事，則又往往髮指恣裂。故下流社會觀演劇而心思開發、志氣感動者，一歲蓋不知凡若干人矣！[105]

因此，欲開通「下流社會」，部份啓蒙者認爲，唯有從事戲曲改良，發揮演劇的社會效應，「除非是改良說書、唱戲，再沒有開通下等社會相好法子了。」[106]此時興起的改良戲曲運動，在清末招致諸多啓蒙人士的參與和討論。[107]

在這樣的集體努力下，清末的戲劇改良運動，蔚爲風氣，包括清政府的一

---

102 異昂，〈說書〉，《晉陽公報》（太原），1908 年 11 月 29 日，第 5 頁。
103 楡，〈論改革習俗之難〉（續），《盛京時報》（瀋陽），光緒三十四年六月十二日，第 2 張。
104 天僇生，〈劇場之教育〉，《月月小說》（上海），卷 2 期 1（原 13 號，戊申人日），頁 4。
105 〈觀本埠梨園集資興學而有感〉，《新聞報》（上海），1905 年 8 月 31 日，第 1 張。
106 〈論開通下等社會的好法子〉，《盛京時報》（瀋陽），光緒三十三年三月二十一日，第 2 張。
107 有關的戲曲改良論述，可參見張仲民，〈清末報刊上改良小說和戲曲論述篇目(1900-1911)〉，收入《新文化史與中國近代史研究》。關於清末的改良戲曲運動，還可參見李孝悌，《清末下層社會的啓蒙運動》（石家莊：河北人民出版社，2001）。近代歐洲早期也曾有啓蒙人士改革大眾戲曲的努力，參見伯克(Peter Burke)著，楊豫等譯，《歐洲近代早期的大眾文化》（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5），頁 251-295。

些開明官員都襄助有加。時任兩江總督的端方在 1907 年 2 月 16 日（光緒三十三年正月丙申）即奏請：「戲劇宜仿東西國形式改良，將使下流社會移風易俗。……此事雖微，實於風俗人心大有關係。」[108]一些天津士紳還集體稟請北洋總督袁世凱，希望袁能出面禁止淫戲、鼓勵改良戲曲。[109]天子腳下的北京，改良戲曲的成果也不稍遜，梁濟就是一個較爲著名的身體力行者，我們於《中外日報》上這則〈記京城戲院改良進化情形〉報導，即可管中窺豹：

> 自玉成班田際雲排演《惠興女士》戲後，票友（京城謂凡工於戲曲而不以唱戲為業者，謂之票友，又謂之頑兒票，若外間之客串也）喬蓋臣排演《烈士投海記》，義順和班崔靈芝排演《女子愛國戲》（梁巨川侍郎濟所撰），均能發揮義氣，有聲有色。每演新戲，觀者皆逾常擁擠，外城廳丞且特告示表彰，並製銀牌以獎勵之。近又有人將張傻子事演成新戲，足見都中近來風氣發達，迥非此前閉塞可比也。[110]

新事業最爲發達的上海首當其衝。上海的一批演員匯合趨新紳商沈縵雲，成立了從事戲曲改良的演出團體——上海新舞臺，邀請一些名角來獻技。一些團體如寰球中國學生會，還在報紙上刊登廣告，邀請新舞臺演唱改良新戲。[111]流風所被，上海的許多社會戲院都開始標榜自己所演爲改良新戲，並連續刊登廣告，招徠觀眾。一些啓蒙人士還在上海、蘇州成立了梨園學堂，培養演出新戲劇的人才。這時候上海學校中演新劇的風氣也漸漸開始流行，開始是在教會學校，後來「上海中國人所辦的學校，學生演戲，也大爲盛行，開什麼遊藝會、懇親會、畢業會以及許多節日，也常常有此餘興。」[112]許多學生劇團在蘇北遭

---

108 朱壽朋編，張靜廬等校點，《光緒朝東華錄》（北京：中華書局，1958），卷 5，總頁 5628。

109 〈天津士紳上袁宮保改良戲曲稟〉，《時報》（上海），1906 年 8 月 14 日、8 月 15 日，均在第 1 張。

110 《中外日報》（上海），1906 年 7 月 4 日，第 7 版。關於清末梁濟在北京從事的戲曲改良活動，可參見羅志田，〈對共和體制的失望：梁濟之死〉，收入氏著，《近代讀書人的思想世界與治學取向》（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2009），頁 150-153。

111 〈寰球中國學生會請新舞臺演唱二十世紀新茶花新戲〉，《時報》（上海），1909 年 6 月 8 日，首頁廣告。

112 包天笑，《釧影樓回憶錄》，冊上，頁 512。

受水災時，還紛紛演劇助賑；一些社會劇團如丹桂茶園，標榜改良文明的自強新戲，也參與助賑活動，演災民情形活靈活現，取得良好效果。[113]有醫院還編出「醫事新戲」，借新戲「詳細指示，演說生理之原因，衛生之方法，能使人人知醫，共登仁壽之域」，同時附以行醫和賣藥廣告。[114]

此時，有的地方還成立了戲劇改良會，「以改良戲劇爲宗旨，以灌輸文明思想、開通下等社會爲目的。」[115]四川就由成都商務總會發起，聯合勸業道、提學使司、巡警道立案成立了戲曲改良公會，爲「補助教育起見」，發行《改良戲曲》系列劇本，「以廣流傳」。[116]山西啓蒙人士也在省城太原設立改良戲曲社，擬「將舊劇本可刪者刪之，可存者存之，並取各國諸大英雄之新事業，及吾國近年以來關於國恥各事，編爲劇本，招徒演習，以期激發國民之志氣。」[117]《安徽俗話報》、《安徽白話報》、《月月小說》、《中國白話報》、《繡像小說》、《小說月報》、《神州日報》、《民立報》、四川的《通俗日報》（《通俗報》）等諸多報刊上還不斷刊載「新戲」、「歷史新戲」、「改良戲曲」、「改良新劇」、「時事新劇」等名目的新戲曲。戲劇改良的呼籲與努力甚至還被體現到當時小學生的國文教材中，如標明爲明德學堂審定、初等小學適用的《國文教科書》中即曰：「若將戲劇改良，取故事或近事，能激發國民之志氣者，演爲戲劇，令人縱觀，則社會之進步，必更遠矣！」[118]

在清末戲劇改良運動中，滿人汪笑儂(1858-1918)的成就比較大。汪曾自謂：「銅笆鐵板當生涯，爭識梨園著作家」；「手挽頹風大改良，靡音曼調變

113 〈演劇助賑〉，《時報》（上海），1907 年 1 月 17 日，第 3 張；〈投書〉，《時報》（上海），1907 年 1 月 18 日，第 3 張；〈學生演劇助賑〉，《時報》（上海），1907 年 4 月 22 日，第 1 張；〈新舞臺演劇助賑〉，《民立報》（上海），1910 年 12 月 14 日，第 5 頁。

114 〈請看醫事新戲〉，《時報》（上海），1908 年 5 月 22 日，第 1 頁廣告。

115 〈戲劇改良會開辦簡章〉，《警鐘日報》（上海），1904 年 8 月 7 日，第 4 版。

116 〈戲曲改良公會廣告〉，戲曲改良公會第一種，《審吉平》（無具體出版資訊，應爲清末刊本，上海復旦大學圖書館藏）。

117 劍公，〈改良戲曲之先聲〉，《晉陽公報》（太原），1910 年 2 月 28 日，第 5 頁。

118 編者不詳，《最新初等小學國文教科書》（湖南機器印刷局印行，無具體出版日期，但可看出爲清末時出版，上海復旦大學圖書館藏），卷 2，第 67 課，〈戲劇〉，頁 30。

洋洋」。[119]1910 年，汪還被聘爲戲劇改良所所長。汪笑儂自己不僅演劇，更改編和創作了很多的劇本，他將自己「憂國憂民」謀求革新的心理通過「高臺教化」，「憑自己的身手口舌，來達到移風易俗的目的」。[120]汪的許多劇本和演出都很受觀眾歡迎，如他根據戊戌事件改編成的《黨人碑》，「此戲上海最有名，人人愛看之」，[121]《新聞報》、《中外日報》等報紙上不斷刊登此戲的演出廣告。《安徽俗話報》第 11 期也曾刊登汪笑儂的《新排瓜種蘭因班本》，其中曰：聽說這本《瓜種蘭因》，是說波蘭國被瓜分的故事，暗寓中國時事，做得非常悲壯淋漓，看這戲的人無不感動。[122]另外，李叔同(1880-1942)和春柳社在清末民初時期也從事了許多改良戲曲的活動，春柳社所演出的《茶花女》、《黑奴籲天錄》等，都是比較成功的作品。[123]當時流行的改良新戲如《瓜種蘭因》、《黨人碑》、《明末遺恨》、《黑藉冤魂》等，或關於歷史，或關於社會，演之亦足以鼓勵人心、喚醒迷夢，頗讓時人印象深刻。[124]

綜觀而論，清季啓蒙人士在改良戲劇方面，對民眾閱讀習慣的改造，花費了不少心血和努力，涉及層次也很廣，得到一些觀眾的認可與傳播媒體的宣傳，應該是收到一定的成效。[125]可惜，最明白反映這個成效的清末改良戲曲劇本總數，已難有較準確的統計，我們只能從後人所編的晚清戲曲名錄中，窺豹一斑。[126]

---

119 中國戲劇出版社編輯部編，《汪笑儂戲曲集》（北京：中國戲劇出版社，1957），頁 298。

120 周信芳，〈敬愛的汪笑儂先生〉，收入《汪笑儂戲曲集》，頁 3。關於汪笑儂的戲曲改良活動，還可參見傅秋敏，〈論汪笑儂的戲曲改良活動〉，《戲劇藝術》（上海），1988 年第 3 期，頁 45-54。

121 劍村遊客輯，《上海》（無出版地點和單位，上海圖書館藏，光緒二十九年鉛印本），頁 9。

122 三愛（陳獨秀），〈論戲曲〉，《安徽俗話報》（上海），期 11（甲辰八月初一日），頁 31。

123 有關這一時期李叔同及春柳社的活動，可參見黃愛華，《中國早期話劇與日本》（長沙：嶽麓書社，2001），頁 13-221。

124 胡祥翰，〈上海小志〉，收入胡祥翰等，《上海小志・上海鄉土志・夷患備嘗記》（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9），頁 32。

125 參見李孝悌，《清末下層社會的啓蒙運動》，頁 163-233。

126 參見阿英編，《晚清戲曲小說目》（上海：上海文藝聯合出版社，1954），頁 1-61；趙晉輯錄，〈戊戌變法前後至辛亥革命報刊發表的戲曲劇作編年〉，《戲曲研究》（北京：文化藝術出版社，1982），輯 6，頁 291-298。

當然，演戲劇也不是沒有缺點，清末啓蒙人士實際上已經認識到這個問題：所謂「開智之術，以筆、以舌、以教，三者蓋缺一不可」。[127]單採取一種「開智」形式，勢必有欠周全，故「毋寧舍小說與劇本，而贊成演說之舉」。[128]以聲教補充文教之不足，這就涉及到清末對演說這一宣傳形式的提倡，「宣講演說之力，實足以輔助同文之化，激發愛國之心。」[129]

其實，以上概括分析了清末啓蒙人士改造民眾閱讀的兩方面情況，並不能全部涵蓋清末啓蒙人士改造民眾閱讀習慣的論述與努力。如本文對當時清政府如何規劃大眾的閱讀沒有涉及，對其他淨化閱讀的努力也付之闕如。事實上，若再放寬一點的話，清末關於刪改時憲書、改良紗燈圖畫、創辦女報與白話報、創設公共圖書館、講報、設立閱報所、關注貧民教育、設立勸學所、籌建半日學堂、出版畫報、編輯教科書、統一語言、推廣世界語、簡化文字等的論述及實踐，雖屬比較廣泛的開民智活動，但也可歸入啓蒙人士改造民眾閱讀的文化政治操作範圍，只是限於篇幅和主題關懷，這兒闕而不論了。

四、申　論

不管那些主張禁淫辭小說的人士，或是要新小說、改良戲曲的啓蒙人士，其政治立場既有革命的，也有立憲的，更有一批混跡於上海十里洋場的文人，還有一些趨新的地方士紳、官僚、青年士子等，其間並沒有清晰的楚河漢界劃分，在政治、文化和社會問題上的差異不妨礙他們在啓蒙、在改造國民立場上的共同認知。即便他們所從事的行業與實踐差別很大，間或不乏緊張與衝突，在實際的文化創作活動中各有關懷，在具體的推行手段上也不盡一致：有人辦

127 〈論四川改宣講爲演說之宜仿行〉，《華字彙報》，1905 年 7 月 31 日，第 5 頁。

128 〈論演說之效果〉，《中外日報》（上海），1905 年 5 月 20 日，第 1 版。

129 〈論今日宜以聲教補文教之窮〉，《中外日報》（上海），1906 年 12 月 9 日，第 1 版。不過，也有時人認爲依靠演說開通民智也很難，「對下流社會的演說尤難」。鐵秋，〈論地方宜設演說研究會〉，《國民白話日報》（上海），戊申八月廿四日，第 2 版。有關情況，可參見陳平原，〈有聲的中國──「演說」與近現代中國文章變革〉，《文學評論》（北京），2007 年第 3 期，頁 5-21。

閱報社，有人資助改良戲曲的編寫和演出活動，有人專事創作與翻譯，有人專事鼓吹和宣講，有人則身體力行去演改良新戲，……但他們在主張利用小說、戲曲文類推動對下層老百姓的教化和啓蒙方面則一，如傳統中國的士大夫一樣，都意識到這些文類對教化民眾的巨大作用。像李孝悌所指出的：「不論是知識份子，或一般的通俗文化創造者，都刻意地利用小說、戲曲，作知識轉介、訊息傳播、社會批判或宣傳教化的工作。」[130]

對於主張淨化民眾閱讀的清季啓蒙人士來說，他們所據以立論的不僅是中國傳統通俗小說、戲曲等文類的感染力，以及廣大下層民眾的力量，更要藉歐美及日本的強國經驗來論證改造民眾閱讀習慣的合法性。早在 1898 年發表的〈譯印政治小說序〉中，梁啓超就非常誇張地認爲：

> 在昔歐洲各國變革之始，其魁儒碩學、仁人志士，往往以其身之所經歷，及胸中所懷，政治之議論，一寄之於小說。於是彼中輟學之子，黌塾之暇，手之口之，下而兵丁、而市儈、而農氓、而工匠、而車夫馬卒、而婦女、而童孺，靡不手之口之。往往每一書出，而全國之議論為之一變。彼美、英、德、法、奧、意、日本，各國政界之日進，則政治小說為功最高焉。[131]

在這些陳義甚高的文字中，政治小說在列強的變革過程中究竟改變了多少人的政治觀念，到底有多少人閱讀了這些政治小說、又受到了多大的影響，都是充滿疑問的問題，至於「每一書出，而全國之議論爲之一變」這樣的論斷，更是任公故爲高論。[132]

梁啓超小說論述中的這種片面性和極端性，又延續到後來，其偏激程度甚

---

130 李孝悌，〈中國近代大眾文化中的娛樂與啓蒙——以改良戲曲爲例〉，收入張啓雄主編，《二十世紀的中國與世界》（台北：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2001），冊下，頁 968。

131 任公，〈譯印政治小說序〉，《飲冰室合集》，文集之三，冊 1，頁 34-35。

132 當時類似的誇大論述還有很多。比如，有人認爲只要有講報的人，「逐日赴茶館通衢，宣講時事，俾里巷粗人同沾文化。……此舉將數千年愚民之政見一掃而空，數千萬愚民昏瞀之頭腦一震而醒，數百府廳州縣拘隅之風氣一棒喝而開。」〈論說報〉，見《學務雜誌》（南京），期 4（光緒三十二年六月二十五日），頁 6-7。

或過之，如陶祐曾即言：「自小說之名詞出現，而膨脹東西劇烈之風潮，握攬古今利害之界線者，唯此小說；影響世界普通之好尚，變遷民族運動之方針者，亦唯此小說。」[133]陶此處已經將小說之作用抬高到無以復加之地步，他還推而把列強進化、大陸競爭全部歸結於稗官說部的力量，顯然充滿了諸多想像、誤解的成分。而將中國舊小說如此貶斥、負面化，顯然矯枉過正，於此也可見當時部份啓蒙人士「尊西趨新」的激進心態。[134]類似的宣傳及心態，無異於「自我吹嘘又自爆其短」，「當梁啓超與其同輩將小說的功效與缺陷相提並論，他們其實是將傳統批評家對說部的畏懼與迷醉同時推到極致，……當他們一廂情願地對未來新文學表示吹捧時，他們其實已成爲自己一心想打倒的舊文學價值的最吊詭的提倡者。」[135]凡此種種，均足以說明清末主張新小說的許多啓蒙人士，並不在乎小說本身的藝術價值如何，看重的依然是其文以載道的特質——對現實的影響、感化作用，借小說、戲曲來影射比附現實，把其看作政治的婢女、爲現實服務的工具，忽略了文學作品最重要的藝術性質，極端誇大了小說、戲曲等文類的社會作用。

在當時改良戲曲的論述中，曾有啓蒙人士主張，欲提倡新戲，應該先改良演員的人格，社會也應該形成尊重演員的風氣。[136]激進者如陳去病還號召青年，「明目張膽而去爲歌伶」。[137]清末興起的學校演劇之風即是響應這種宣導

[133] 陶祐曾，〈論小說之勢力及其影響〉，《遊戲世界》，期 10，轉見陳平原、夏曉虹編，《二十世紀中國小說理論資料》，卷 1，頁 226。

[134] 如胡適當年即有這種心態：「予幼嗜小說，惟家居未得新小說，惟看中國舊小說，故受害滋深。今日腦神經中種種劣根性皆此之由，雖竭力以新智識、新學術相挹注，不能泯盡也。」胡適 1906 年 5 月 1 日日記。見曹伯言整理，《胡適全集》（合肥：安徽教育出版社，2003），冊 27，頁 23。後來，楊樹達亦曾認爲：「原來我們中國人有鄙視小說的精神，這也本難怪。因爲中國的小說，不是誨盜，就是誨淫，沒有好小說。」楊樹達，〈教育和文字〉，《湖南教育月刊》（長沙），卷 1 號 1（1919 年 11 月），頁 8。也有人認爲青年所以多病，在於其喜讀淫辭小說。參見周逢儒，〈青年期之身弱多病，其原因在喜閱小說〉，《紹興醫藥學報》（紹興），卷 12 號 7（1922 年 7 月 20 日），頁 28-29。

[135] 王德威著，宋偉傑譯，《被壓抑的現代性——晚清小說新論》（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2005），頁 33。

[136] 〈提倡新戲須先改良優界之人格〉，《通俗日報》（成都），宣統二年三月初三日，第 1 面。

[137] 佩忍（陳去病），〈論戲劇之有益〉，《二十世紀大舞臺》，期 1，轉見阿英編，《晚清文學叢鈔・小說戲曲研究卷》（北京：中華書局，1960），頁 64。

的鮮明體現。然而一旦涉及到具體的伶人問題，我們可以發現啓蒙人士對優界的偏見依然廣泛存在，這種心態通過一些他們關於優伶事件的議論，可一覽無遺。1911 年 6、7 月間，天津伶人元元紅拐了「某紳之妾」，引起各報「大書特書，百般罵詈」。[138]力主啓蒙的《大公報》對此也發表了多篇評論，其中一則評論道：

> 元元紅不過一下賤優伶，尚不足怪。以娼妓而姘優伶，其人格本屬相當，亦不足怪。而最可怪者，顯宦巨賈每喜娶娼妓為姬妾，縱令出外聽劇，以貽此中冓之羞。[139]

從這則閑評中，我們可以察覺出評論者所流露出來的濃厚等級意識及優越感，而從此前各報對發生在上海的「淫伶」李春來「姦淫案」一事的報導中，我們亦可發現更多類似的評論。[140]

與啓蒙人士中出現將中國舊小說極度貶斥的現象類似，一些主張改良戲曲的人士亦同樣有將中國傳統戲曲「負面整體化」的傾向，他們攻擊中國舊戲曲，認爲中國舊戲，「綜其大要，不外寇盜神怪男女數端」。[141]還有人認爲「中國舊時的戲本」——「全係報應的主義」。[142]陳獨秀甚至將中國國民的劣根性根源也歸之爲舊戲曲：「我們中國人這些下賤性質，那一樣不是受了戲曲的教訓！」[143]這類將舊戲曲（包括舊小說）「負面整體化」的評論，實際延續了從譚嗣同、樊錐以來激進反傳統的思維方式，且表明這種「負面整體化」的心態與做法已滲透到大眾文化領域，不只體現在清末民初的菁英學者對中國傳統學

---

[138] 安□，〈社會之心理如此〉，《大公報》（天津），1911 年 6 月 29 日，第 3 張。

[139] 夢幻，〈閑評二〉，《大公報》（天津），1911 年 6 月 25 日，第 2 張，第 1 版。

[140] 關於李春來(1855-1925)案，《中外日報》、《神州日報》、《時事報》、《世界繁華報》、《民立報》等上海報紙在 1907 年 10-11 月、1908 年 5-10 月、1910 年 8-10 月間都有大量相關的報導與評論，這些論述幾皆稱李春來爲「淫伶」，亦有評論稱之爲女界「惡魔」。〈滬事評論〉，《神州日報》（上海），1910 年 10 月 8 日，第 4 頁。

[141] 箸夫，〈論開智普及之法首以改良戲本爲先〉，《之罘報》（煙台），期 7（光緒三十一年四月十一日），頁 3-4。

[142] 伯耀，〈改良新戲系轉移社會風氣的妙藥〉，《嶺南白話雜誌》（廣州），期 4（戊申正月二十九日），頁 8。

[143] 三愛（陳獨秀），〈論戲曲〉，《安徽俗話報》（上海），期 11（甲辰八月初一日），頁 1。

術與思想層面的批判。[144]

就改造閱讀論述的中心產地上海而言，存在大量劇社（茶園）借賑濟之名演劇斂錢、作廣告，甚至有組織借賑濟之名強行演劇賺錢的現象。[145]另外，一些上海劇院標榜自己所演爲新戲，實則仍是舊戲的改頭換面，在廣告上增加新的噱頭而已，內容與舊戲並無大異。按舊標準來看，同樣可以「誨盜誨淫」，不過是「藉公益之虛名，縱遊戲之大欲」，「今日滬上之所演者何劇耶？《翠屏山》、《富春樓》之誨淫也，《白水灘》、《四傑村》之誨盜也。」[146]正可謂：「實見近來大率假改良社會之名，而隱爲敗壞風俗之事。」[147]

再拿讀者來說，雖然有諸如《月月小說》這樣的刊物，明確標榜是面向社會各階層讀者辦的，也有讀者認爲《月月小說》「官場中應看」、「維新黨應看」、「歷史家應看」、「實業家應看」、「詞章家應看」、「婦女們應看」。[148]但在實際生活中，新小說的讀者往往還是有一定經濟基礎的讀書人而非「下等人」，「小說所收之結果，仍以上流社會爲多」。[149]比如鄭孝胥、孫寶瑄等人的日記中，不斷有他們購閱新小說的記載。思想較守舊的官僚惲毓鼎也留下不少他讀新小說譯作的記載，他尤喜讀林紓翻譯的小說。[150]這些情況表明，絕大多數新小說的讀者實質上還是有閑、有錢的階層，而非爲生計四處奔波的下層民眾，「只能供文人學士之流覽，而普通之人不能解其文義及洞其道理者。」[151]

144 關於清末民初菁英學者對中國傳統的批判，可參見羅志田，〈中國傳統的負面整體化：清季民初反傳統傾向的演化〉，收入李國章、趙昌平主編，《中華文史論叢》（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3），輯 72，頁 225-251。

145 參見〈上海之評論〉，《神州日報》（上海），1909 年 10 月 18 日，第 4 頁；指嚴，〈論上海近日演劇籌費之風〉，《時報》（上海），1911 年 1 月 1 日，第 1 張。

146 〈論滬上新流行之害人物〉，《時報》（上海），1909 年 11 月 9 日，第 1 張。

147 〈論報館與戲子〉（〈辨尊崇優伶之邪說〉），《芻言報》（北京），宣統二年十一月初一日（1910 年 12 月 2 日），內編第 2 版。

148 報癖，〈論看《月月小說》的益處〉，《月月小說》（上海），卷 2 期 1（原 13 號）（戊申人日），頁 1-9。

149 〈小說叢話〉中平子（狄楚青）語，《新小說》（橫濱），號 7（光緒二十九年七月十五日），頁 167-168。

150 參見惲毓鼎著，史曉風整理，《惲毓鼎澄齋日記》（杭州：浙江古籍出版社，2004），冊 1，頁 315、319、321。

151 樊，〈小說界之評論及意見〉，《申報》（上海），1910 年 1 月 20 日，第 1 張，第 3 版。

《中外日報》上也有人感歎：「諸君不見新出之各小說乎？仍見之於我輩案頭耳！夥計櫃檯上有此物乎？東洋車夫手中有此物乎？而傭媼侍婢無論也。此其弊不在彼等不讀書，而實由我等之不讀書，漫然而與之。」[152]造成這種情況的原因是多方面的，其中最重要的一個原因就是許多啓蒙人士不明瞭下層人之生活及心理狀態，乃至長期以來形成的閱讀文化傳統之慣性，生產出的多數新小說脫離實際，空言說教，不符合大眾欣賞口味與接受水平，難以達到改造閱讀、啓蒙大眾的效果，致使新小說的流行陣地以城鎮居多，「里巷間之頑夫、稚子、婦人，依然但知《三國》、《水滸》、《西遊記》。而能知新小說之名者，百不一二；其能稱頌新小說之美者，蓋罕聞也。」[153]

儘管小說、戲劇對讀者確實有潛移默化作用，但閱聽者從中得到休閒和娛樂才是主要目的，於焉受到教化和從中閱世知人，只是伴隨效應，「人之所以樂觀劇者，非於此中尋道德與學問也。樂其有英雄兒女無限離奇濃郁之事，可暫移我情而已。」[154]進言之，讀者閱讀新小說和觀聽改良戲劇，未必就一定接受或願意接受其宣揚的啓蒙理念，更多還是因爲欣賞其情節或敘事，能心有戚戚，從中得到慰藉與釋放，一如上文所引，小胡適與那個投書給《時報》的讀者之欣賞《雙淚碑》、惲毓鼎之喜讀林譯等新小說。他們之所以喜讀這些小說，仍在於其敘事感人與文筆（譯筆）合乎文法，只有非常趨新和知新的像孫寶瑄、黃遠生那樣的極少部份士人，才會更在意其所傳達的啓蒙理念與現代化追求。

至於像《官場現形記》、《茶花女遺事》、《迦茵小傳》、《孽海花》、福爾摩斯系列等異常暢銷的新小說，對於很多讀書者而言，參照傳統的「禁書」論述，其在「誨淫誨盜」方面或許一點都不會亞於《紅樓夢》、《水滸》等在「禁書」之列的中國舊文類。如《官場現形記》即被時人當作官場指南來閱讀，像寫於 1907-1908 年的《後官場現形記》所言：

---

152 〈說小說〉，《中外日報》（上海），1902 年 4 月 10 日，第 1 版。

153 樊，〈小說界之評論及意見〉（續），《申報》（上海），1910 年 1 月 22 日，第 1 張，第 3 版。

154 〈論興學練兵作小說，其效不及演戲之速〉（續昨稿），《中外日報》（上海），1903 年 11 月 16 日，第 1 版。

> 無奈讀書的只看了（《官場現形記》）一面，當作他處世的金針，為官的秘寶，專心致志，竭力仿摹，六七年來，成就人才確實不少。所以《官場現形記》竟美其名為「官場高等教科書」，不脛而走，海內風行，洛陽紙貴。[155]

出版商亦在報刊上大作廣告，大言不慚地聲稱《官場現形記》是「官場教科書」，[156]「今之官場中人無不喜讀此書」，並要人「不可不看」、「不可不學」。[157]還有人謂林譯言情小說《迦茵小傳》，實質是「傳其淫也，傳其賤也，傳其無恥也」。又說林譯諸書：「半涉於牛鬼蛇神，於社會毫無裨益。」[158]民初亦有人指責晚清新小說中「最占勢力」的「偵探小說、愛情小說」，「其誨淫誨盜更有甚於昔者」，特別是給讀者展示了「陰謀詭計」、「蛇蠍其心，豺狼其行」、「唯利是圖」面向，即如福爾摩斯之類偵探小說，「類多據一二偵探家之事實，而鋪張揚厲之，故離奇其事，以顯偵探之巧，庸詎知誨盜即基於此！……愛情小說，則弊更甚。……假自由名義，遂淫亂目的；竊文明虛聲，忘廉恥大義……。」[159]後來，周作人也曾對清季這種現象表達過不滿：「歐洲文學的小說與中國閒書的小說，根本全不相同，譯了進來，原希望可以糾正若干舊來的謬想，豈知反被舊思想同化了去，所以譯了《迦茵小傳》，當泰西《非煙傳》、《紅樓夢》看；譯了《鬼山狼俠傳》，當泰西《虯髯客傳》、《七俠五義》看；將查白土書店編給小孩作文練習用的短篇故事，譯成了《詩人解頤語》，當作泰西《聊齋》看。」[160]

前引諸例證，不但表明出版商、著譯者在實際出版、寫作過程中重利輕義、

---

155 白眼，《後官場現形記》，收入董文成、李勤學主編，《中國近代珍稀本小說》（瀋陽：春風文藝出版社，1997），冊 14，頁 477。

156 「請讀官場教科書」，《時報》（上海），1905 年 6 月 22 日，首頁廣告。

157 〈《官場現形記》初、二編售書告白〉，《世界繁華報》，1904 年 6 月 17 日；〈讀《官場現形記》者，看！看！看！〉，《世界繁華報》，1903 年 10 月 22 日。轉見薛正興主編，《李伯元全集》（南京：江蘇古籍出版社，1997），冊 5，頁 151-153。

158 寅半生，〈讀《迦茵小傳》兩譯本後〉，《遊戲世界》，期 11，引文轉見陳平原、夏曉虹編，《二十世紀中國小說理論資料》，頁 230。

159 徐章垿，〈論小說與社會之關係〉，《友聲》（杭州），期 1（1913 年 8 月），頁 11。

160 仲密（周作人），〈論黑幕〉，《每週評論》（北京），號 4（1919 年 1 月 12 日），第 2 版。

嘩眾取寵的取向，亦表明讀者閱讀新小說過程中存在的選擇性、功利性、獵奇心態與情欲等人之常情，以及文本在被閱讀和接受過程中具有的開放性和複雜性。難怪即使是在新小說創作和出版蒸蒸日上之際，也有人另持異議，認爲小說只是讀者消遣的娛樂品，不應擔負太多藝術之外的責任：「所謂風俗改良、國民進化，咸惟小說是賴。又不免譽之失當。」[161]改良戲曲亦何嘗不如是？十九世紀中葉的士大夫余治所編的諸多教化劇，因空言說教，內容陳腐正統，不符合老百姓的欣賞趣味，流傳不廣。清末的改良戲劇運動亦不免此弊，到後來每況愈下，越來越流於形式和說教，內容多刻板重複，穿新鞋走老路，貽下優孟衣冠之譏，墮入「雜亂粗野，無理取鬧」一途，不若「舊排各戲曲詞關目均有情致」。[162]很多人，特別是女性，依然對「改良新戲、文明新戲，全不愛聽。那個園子有淫戲，那個園子多上女座。女座多，男座就不少……。」[163]這些出自知識菁英的描述或不乏誇飾之處，但就歡迎程度言，「淫戲」對於閱聽者的吸引力的確遠超過改良新戲。或許是意識到這個問題，清末的某些改良戲曲，爲吸引觀眾，竟借用情色的宣傳或場景，如脫衣舞或裸女表演，來聚攏人氣，以宣傳啓蒙和革命。[164]

此外，清季新小說與改良戲曲的生產者在實踐中也未必能始終貫徹這些啓蒙理念，他們許多的創作及呼籲往往流於表面，恰如王德威指出的，小說創作乃「空中樓閣」，可以任由作者「馳神幻想」，故此，在最終的作品呈現上，清季小說展示出一個「多音複義」、「眾聲喧嘩」的局面，並非僅是單一的啓蒙或現代性指向。[165]清季的戲曲改良運動，亦半斤八兩，那些打著「文明新劇」招牌的改良新戲，吸引觀眾的多是其才子佳人式的故事情節，加上扮演者的外

[161] 覺我，〈余之小說觀〉，《小說林》（上海），期 9（戊申年正月），頁 2。
[162] 《惲毓鼎澄齋日記》，冊 1，頁 358。
[163] 〈婦女不可聽戲〉，《通俗報》（即《通俗日報》，只是自 1910 年 3 月 20 日後個別期自稱爲《通俗報》）（成都），宣統二年三月二十日，第 1 面。
[164] 參見李孝悌，〈中國近代大眾文化中的娛樂與啓蒙——以改良戲曲爲例〉，收入《二十世紀的中國與世界》，冊下，頁 984-987。
[165] 參見王德威，《被壓抑的現代性——晚清小說新論》，頁 20-21。

形、投入程度及有關的八卦。而多數著譯者、改編者、扮演者，乃是打著新小說和戲曲改良的大旗，實際是其「爲稻粱謀」的工具與藉口，「著書與市稿者，大抵實行拜金主義，苟焉爲之」。[166]「蓋操觚之始，視爲利藪，苟成一書，售諸書賈，可博數十金，於願已足，雖明知疵累百出，亦無暇修飾。」[167]他們毋寧更在意這些文類的符號效應及其生產後所帶來的經濟價值，而非其啓蒙作用與社會效果。

總體上看，清季這些所謂新小說、改良戲曲，內容五花八門，質量參差不齊，「議論多而事實少」，「開口見喉嚨」；大多數作品粗製濫造、半途而廢。眞正優秀的新小說、新戲曲且能達到啓蒙效果者，在清末文化市場上屬鳳毛麟角，並不多見。《月月小說》上即有文章批評此種現象道：「今試問，萃新小說數十種，能有一焉如《水滸傳》、《三國演義》影響之大者乎？曰：無有也。萃西洋小說數十種，問有一焉能如《金瓶梅》、《紅樓夢》冊數之眾者乎？曰：無有也。」[168]新文類的實踐者創作不出足以抗衡舊經典的新作；在翻譯小說方面亦多率爾操觚之作，譯品欠佳，價格又貴；出版商出版的作品又濫竽充數、但爲利來，讀者的閱讀趣味自然會移向他處，啓蒙關懷在此狀況下自然會被邊緣化與空洞化。

之後，爲吸引心不在此的讀者，著譯者和出版商推出的新小說，已經越來越走上八卦豔情、黑幕，乃至色情之路。民國初年，新小說的教父梁啓超觸景生情感慨道：「今日小說之勢力，視十年前增加倍蓰什百」，「其什九則誨盜與誨淫而已，或則尖酸輕薄毫無取義之遊戲文也。於以煽誘舉國青年弟子」，梁復將此時社會風氣墮落的始作俑者歸咎於新小說——「何一非所謂新小說者

166 天僇生，〈中國歷代小說史論〉，《月月小說》（上海），卷 1 號 11（光緒丁未十一月），頁 5。

167 寅半生，〈《小說閑評》敘〉，《遊戲世界》，期 1，轉見陳平原、夏曉虹，《二十世紀中國小說理論資料》，頁 182。

168 天僇生，〈中國歷代小說史論〉，《月月小說》（上海），卷 1 號 11（光緒丁未十一月），頁 5。

階之厲？循此橫流，更閱數年，中國殆不陸沉焉不止也。」[169]梁語可謂深刻的自我解剖，亦不啻自打耳光，重歸以前主張禁「淫辭小說」的正統派論調，然從中顯示出梁啓超對小說社會作用的重視，則一以貫之，歷經十數年而未改。羅家倫 1918 年發表的〈今日中國之小說界〉一文，[170]也秉居小說足以感化社會的立場，對民初小說中借新小說名義而氾濫的才子佳人、妖魔鬼怪、黑幕、情色內容的小說嚴加斥責，亦反證清末新小說運動之餘緒，已大出啓蒙人士本來的設想及控制。

改良戲曲運動到了民初，其負面效應更是變本加厲。一些「新劇家」借用文明新戲的招牌，從傳統小說以及當時流行的鴛鴦蝴蝶派小說中找材料，東拼西湊，滿口新名詞，嘩眾取寵，使得當時流行的所謂文明新劇，實際「是退化的，是墮落的，是誨淫誨盜的，不但不配在世界底戲劇界裏占得位置，就把初興的新劇拿來一比，也不覺得要起『每況愈下』、『一蹶不振』的感想。」[171]而某些新劇的演員和編者，不過是「幫閒惡少，盡作名優」，[172]其日常行爲多爲時人不齒。民初小說家朱瘦菊（海上說夢人）在小說《歇浦潮》中，即對滬上所謂「新劇家」的表現，借「錢秀珍」之口揭露道：「我道新劇家是何等人物？卻原來聚著一班淫棍，還要誇什麼開通民智，教育社會，簡直是傷風敗俗罷了。」[173]接著，作者又特意借一妓女之口進一步挖苦「新劇家」薄情寡義，連妓女都不如，「心目中只有金錢二字」，「眞所謂衣冠禽獸」。[174]還有觀察者從積極的角度分析，亦不得不承認：「號爲改良社會之新劇家，除描繪一二社會現形外，演唱數年來，其實際之足以感化社會者。究有若何影響？此非反

169 梁啓超，〈告小說家〉，原刊《中華小說界》（上海），卷 2 期 1（1915 年 1 月 1 日），收入《飲冰室合集》，文集之三十二，冊 4，頁 67。
170 《新潮》（北京），卷 1 號 1（1919 年 1 月 1 日），頁 106-113。
171 陳大悲，〈中國的新劇沒有迎合群眾心理嗎〉，《曙光》（北京），卷 2 期 3（無署具體出版時間），頁 33-34；參見陳光輝，〈改良戲劇芻言〉，《復旦》（上海），期 2（1916 年 6 月），頁 15-20。
172 黃遠生，〈新劇雜論〉，收入黃遠庸，《遠生遺著》（北京：商務印書館，1984），卷 4，頁 193。
173 海上說夢人，《歇浦潮》（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1），冊上，頁 130。
174 海上說夢人，《歇浦潮》，冊上，頁 131。

對新劇也。戲劇之改良社會，爲一部份之教育方法，實亦普及教育之輔佐品。是故國內教育不普及，僅恃此少數人以演唱新劇謀風俗之改良，杯水車薪，豈僅無濟，十寒一曝，甯易成功。」[175]無怪乎五四新文化運動時期，知識分子又要大力提倡戲曲改良。

五、結　論

綜上所述，作爲在清末語境裏極度流行的文化符號，新小說與改良戲曲也一樣是眾聲喧嘩、多元雜陳的論述空間與開放地帶，而非僅具有啓蒙意義。此外，作爲傳播媒介的存在形式和表現方式，新小說與改良戲曲本身自然具有可操縱性、欺騙性和利益導向性。由是，新小說與改良戲曲難免成爲各種思想論述、現實利益互相援引、爭奪、頡頏的場域。倡導者、評論者利用其宣傳啓蒙、改造大眾文化；一些政府官員利用其塑造開明形象和網羅人才；報章雜誌利用其吸引讀者、增加銷量；作家與譯者則爭先著譯改編之，以獲得稿費和「符號資本」；商人利用其謀取利潤並表示趨新；醫院攀附之利用其來擴大知名度，諸如此類。在這樣不同維度的生產和複製、展演與利用、傳播和泛化過程中，新小說與改良戲曲運動逐漸蔚爲大國，展現出了強大的符號效力，一定程度上確實促進了清季下層社會的啓蒙運動。但也正是在此過程中，新小說與改良戲曲日益偏離了其最根本的藝術特質以及啓蒙人士的規劃，在不同脈絡、不同閱聽者那裏呈現出不同甚或大相徑庭的閱讀價值及附加意義，最後日益變得濫情化、商業化與形式化。加上清政府有意無意地掣肘，[176]都使得新小說與改良戲曲運動的效果大打折扣。恰似《大公報》上刊出的一個總結：

---

[175] 姚公鶴，《上海閒話》（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9），頁 122。

[176] 如清學部即曾在宣統元年四月初十日密電駐日大臣及監督，批評留日學生「以改良戲曲爲名，結社演劇，不但敗壞學風，而且流弊甚大」，要其「設法禁止」，並查明「爲首提倡暨隨從附和之學生姓名」。總務司，〈致使日大臣禁止遊學生結社演劇電〉，收入總務司案牘科，《學部奏諮輯要續編》（原書爲線裝，無具體出版信息，上海辭書出版社圖書館藏本。另，台北文海出版社曾出版有此書影印本），原書無頁碼。

> 小說新矣，而附會則依然如舊也，是謂新說部舊稗官；戲曲新矣，而俚俗則依然如舊也，是謂新劇碼舊伶工；社會新矣，而現象則依然如舊也，是謂新組織舊人物。[177]

區區數語，實可概括清末新小說和改良戲劇運動之效果，亦爲我們昭示了清季啓蒙人士藉此改造民眾閱讀習慣的成效乏善可陳。

畢竟，閱讀並非一個抽象的或理想化的行爲，閱聽者有著極大的主動性。綜合前文論述中有關閱聽者的回應情況可知，儘管在吸收啓蒙關懷與樹立國民意識方面，一些清季讀者對新小說和改良戲等文類的閱聽反應，與啓蒙人士改造大眾閱讀的規訓雖有契合之處，但多是方枘圓鑿，讀者較在乎的仍是從中獲得刺激、娛樂和放鬆，而非認同與接納那些宏大及抽象的外在預設。在此意義上可說，文本的內容如何其實並不重要，關鍵在於讀者是否善於讀書，「以新眼讀舊書，舊書皆新書也，以舊眼讀新書，新書亦舊書也。」[178]清季的大多數閱聽者，他們都屬不善讀新書的人，不可能完全按照啓蒙人士所期望的那樣，順利接受外來的新文類及閱讀規訓，他們對於倡導者、譯著者與出版者、改編者、評論者各方的預設及期望，不會也不可能照單全收——對新小說和改良戲曲的象徵意義和啓蒙教化方面尤爲如此，他們往往是從其所熟悉的事物及角度對之進行拼湊與聯繫，經常是以「舊眼讀新書」，所謂「無神仙鬼怪不足以成小說，無喜怒哀樂不足以成小說，無奸盜邪淫不足以成小說，無貧賤富貴不足以成小說，無忠孝節義不足以成小說。」[179]只有類似內容的新文類才易得到他們的認同與欣賞，帶有啓蒙色彩卻又缺乏此類成份的新文類，特別是一些新小說和改良戲對讀者程度的要求頗高，未必能讓他們戚戚於心。正像某些啓蒙者所標榜的，「無格致學不可以讀吾新小說」、「無警察學不可以讀吾新小說」、「無生理學不可以讀吾新小說」、「無音律學不可以讀吾新小說」、「無政治

[177] 夢幻，〈過渡時代四〉，《大公報》（天津），1911 年 8 月 17 日，第 3 張。
[178] 孫寶暄，《忘山廬日記》，冊上，頁 526。
[179] 徐章塝，〈論小說與社會之關係〉，《友聲》（杭州），期 1（1913 年 8 月），頁 10。

學不可以讀吾新小說」、「無論理學不可以讀吾新小說」。[180]諸如此類之懸鵠，不消說一般讀者望塵莫及，恐怕多數啓蒙人士也只能望洋興歎。無怪通俗易懂、平易近人的「淫辭小說」，其魅力遠大於那些質量參差不齊的新小說和改良戲。

又如本文第二部份所揭示的，「淫辭小說」以其描述的情事、表達的思想，同社會大眾之文化消費需求、日常生活和集體想像若合符節，最爲他們喜聞樂見、耳熟能詳。職是之故，「淫辭小說」在當時即便被禁止閱聽，而其別具一格的吸引力，愈禁愈增加其誘惑力，所謂「勃勃而莫能遏，於是多方百計以覓得之，潛訪轉懇以搜羅之。未得則耿耿於心胸，縈縈於夢寐；既得則茶之餘、酒之後，不惜糜腦力、勞心神而探索之、研求之。至其價値之優劣、經濟之低昂，固不計及也。」[181]此語雖不乏渲染、誇大之處，但從中顯示閱聽者之主體性，乃至此種閱讀文化的頑強生命力，則是毫無疑問的。

或可說，啓蒙人士從外部強加改造閱讀的論述與行動，短時期內也許會對一般閱聽者造成影響，但不可能完全改變他們長期以來形成的閱讀習慣及思維方式。一般而言，焦大不會愛上林黛玉，下里巴人欣賞不了也不太樂意欣賞陽春白雪，強迫焦大與林黛玉結合、下里巴人去欣賞陽春白雪，恐怕只會造成悲劇。大眾文化包括大眾的閱讀習慣，其形構和社會根源極爲繁複深遠，欲袪除千數百年的積習，需要一個長期複雜的歷史過程，「今擬一旦去之，其力固有所不及」。[182]但啓蒙菁英階層期望迅速開通、動員「下流社會」，爲此目的，甚或採用文化暴力或專制手段亦在所不惜——「宜用秦始皇焚書坑儒之手段，嚴厲以圖之」，[183]如此強勢的啓蒙論述，鋒芒所及，自然會造成一些蔑棄傳統、粗暴貶低大眾文化的現象，反而加深人們的誤解，使大眾產生更多的疏離感和

[180] 〈讀新小說法〉，《新世界小說月報》，期 6、7，轉見陳平原、夏曉虹編，《二十世紀中國小說理論資料》，頁 277-278。
[181] 陶祐曾，〈論小說之勢力及其影響〉，《遊戲世界》，期 10，轉見陳平原、夏曉虹編，《二十世紀中國小說理論資料》，頁 227-228。
[182] 〈論舊俗不可驟易〉，《中外日報》（上海），1904 年 11 月 3 日，第 1 版。
[183] 津門清醒居士，〈開民智法〉，《大公報》（天津），1902 年 7 月 21 日，未標版面。

戒備心。事與願違，欲速不達，最終還會讓改革與啓蒙舉步維艱，使本來要走向販夫走卒、重視下層社會的開民智運動，在效果上適得其反、南轅北轍。[184] 恰如費孝通先生之言：「否定傳統的情感。這情感固然是促進社會去改革文化的動力，但是也可以使改革的步驟混亂而阻礙了改革的效力。」[185]揆之近代世界其他國家的類似舉動，也多以高開低走、無果而告終。[186]包括中共後來強制推行的革命文藝路線，特別是樣板戲運動，雖得逞於一時，但最後一樣以失敗和飽受爭議終結。可以想見，清末啓蒙人士利用傳播媒體希望從創作新小說、改良戲曲等方面來改造民眾之閱讀習慣，期待下層社會的民眾，有「禮義」和「教化」，「養人格、保國體」、「合文明之程」，[187]其目標只是一種理想，

---

[184] 而吊詭的是，一旦眞正地服從於一般大眾的需求，根據大眾的意志來推行啓蒙與改革，委屈遷就之，其結果勢必又與啓蒙的理念相悖反。故陳景韓在清末即曾指出：「改良與仍舊，二者不可並列者也。唯仍舊不良，故欲改，然改良必不能恰合社會之程度。然欲合社會之程度，必須順社會之習慣。然我每見欲順社會之習慣，而事事悉模仿社會之舊習者矣，雖欲改良，安得而改良哉？」冷，〈敬告改良家〉，《時報》（上海），1908 年 2 月 18 日，第 5 頁。更有甚者，一些滿腔熱血試圖改革習俗、推介文明的人，把持不住，往往還會「轉爲習俗所改革，將爲舊社會所同化，不得不舍個人之心理，以來社會之心理」。榆，〈論改革習俗之難〉，《盛京時報》（瀋陽），光緒三十四年六月十一日，第 2 張。

[185] 費孝通，《鄉土重建》（上海：觀察社，1948），頁 151-152。

[186] 如在法國大革命前，啓蒙哲學家的著作因爲是「禁書」，只能在地下流通，老百姓卻百般搜尋閱讀；而 1789 年革命者掌握了權力後，啓蒙思想家的著作已經合法化，可以公開出版發賣；新政府且大力提倡人民閱讀這些書籍。但吊詭的是，這時閱讀大眾卻不願再讀這些書籍，他們需要的更多是娛樂而非教化、私人感情的故事，亦非關於公共價值的理性論述。於是，新政府不得不重祭舊制度下的禁書與書報檢查制度，來查禁那些通俗文學，並提倡啓蒙書籍。不同的是：舊制度下的書報檢查制度是由私人掌控，實行起來遠非嚴格與徹底；但在新體制下，檢查制度由中央政府控制，執行起來較迅捷有力，但效果同樣不佳。有關的討論可參見 Carla Hesse, *Publishing and Cultural Politics in Revolutionary Paris, 1789-1810* (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1991), pp. 240-244. 十九世紀初年英國的普通讀者的閱讀亦朝著娛樂化的方向發展，這也曾引起一些評論者的擔憂，擔心會導致道德墮落與玩物喪志，然而閱讀的娛樂化、休閒化趨勢卻不可逆轉。Richard D. Altick, *The English Common Reader: A Social History of the Mass Reading Public, 1800-1900* (Columbus: Ohio State University Press, 1998), pp. 368-376. 十九、二十世紀早期的英國工人階級讀者，亦沒有服從英國文化菁英爲其量身打造且展現文化霸權的閱讀規訓，他們在書籍的選擇方面同樣有極大主動性，特別喜歡手抄本與左翼作家的著作；他們即便閱讀那些體現文化菁英要求的書籍，也沒有接受那些正統的閱讀規訓。Jonathan Rose, "Reading the English Common Reader," in David Finkelstein and Alistair McCleery, eds., *The Book History Reader* (London and New York: Routledge, 2002), pp. 327-328.

[187] 〈論中國士大夫宜注意下流社會〉，《中外日報》（上海），1905 年 12 月 25 日，第 1 版。

猶如海市蜃樓，可望而不可及。這種對大眾閱讀文化的改造和規訓，勢必不了了之，效果難副所期。[188]

[188] Carlo Ginzburg 的《乳酪和蟲子》(*The Cheese and the Worms*)，依據教會的審判檔案，對被審判者——十六世紀的一個磨坊主曼諾齊(Menocchio)，及其所讀的書乃至其宇宙觀進行了分析，發現曼諾齊是一個複雜的、有主見的思想者，他讀了大量信仰、哲學和遊記方面的書籍，結合他本人熟知的口述傳統，曼諾齊對許多問題都有不同於時代潮流的見解，其閱讀及思考後形成的信仰和宇宙觀，與當時教會的正統規訓很相悖反。Carlo Ginzburg, *The Cheese and the Worms: The Cosmos of a Sixteenth-Century Miller*, trans. John Anne Tedeschi (London and Henley: Routledge & Kegan Paul, 1980). 上引 Martyn Lyons 的研究，也揭示了十九世紀法國下層社會的讀者，包括女性讀者，亦非等待被規訓和指導的消極主體，他們有屬於自己的文化實踐，他們也是在積極建構自己明顯有別於菁英與教會要求的閱讀文化；即使他們也可能閱讀屬於「菁英文化」的正統文本，但也是根據自己的需要和知識水準來理解和使用的，且往往脫離正統的規範。而大眾一旦掌握了「閱讀」，更不會輕易就範於外加的條條框框。當然，這種對正統文本的異端化解讀和「挪用」，以及「過河拆橋」現象，實屬一種便宜行事的「弱者的武器」，為對抗與消解外來「文化霸權」的有效策略。

徵引書目

一、史料

《大公報》（天津），1902、1906、1909、1911。
《大公報》（長沙），1919。
《小說林》（上海），1907-1908。
《中外日報》（上海），1902-1908。
《月月小說》（上海），1906-1908。
《民立報》（上海），1910-1911。
《申報》（上海），1905、1909-1910。
《時報》（上海），1905-1909、1911。
《晉陽公報》（太原），1908、1910。
《神州日報》（上海），1907-1910。
《盛京時報》（瀋陽），1907-1908。
《通俗日報》（個別期亦自稱《通俗報》）（成都），1909-1910。
《新小說》（橫濱，13 號之後在上海出版），1902-1903、1905。
《新民叢報》（橫濱），1902-1903。
《新聞報》（上海），1904-1905。
《繡像小說》（上海），1903。
〈論四川改宣講爲演說之宜仿行〉，《華字彙報》（上海），1905 年 7 月 31 日。
〈論報館與戲子〉（〈辨尊崇優伶之邪說〉），《芻言報》（北京），宣統二年十一月初一日。
〈論說報〉，《學務雜誌》（南京），期 4，光緒三十二年六月二十五日。
〈戲劇改良會開辦簡章〉，《警鐘日報》（上海），1904 年 8 月 7 日。
丁婉宜，〈女子德性之修養〉，《中華婦女界》（上海），卷 2 期 3，1916 年 3 月 25 日。
三　愛（陳獨秀），〈論戲曲〉，《安徽俗話報》（上海），期 11，甲辰八月初一日。
上海圖書館編，《中國近代期刊篇目匯錄》，卷 1。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80。
上海圖書館編，《汪康年師友書箚》，冊 1-2。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6。
中國社會科學院近代史研究所編，《義和團史料》，冊上。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1982。
中國戲劇出版社編輯部編，《汪笑儂戲曲集》。北京：中國戲劇出版社，1957。
文　康，《兒女英雄傳》。北京：十月文藝出版社，1995。
王利器輯錄，《元明清三代禁毀小說戲曲史料》（增訂本）。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1。
王相箋注，《女四書》。上海：復旦大學圖書館藏，光緒戊申年(1908)江陰源德堂藏版。
包天笑，《釧影樓回憶錄》。太原：山西古籍出版社、山西教育出版社，1999。

白　眼，《後官場現形記》，收入董文成、李勤學主編，《中國近代珍稀本小說》，冊 14。瀋陽：春風文藝出版社，1997。
朱壽朋編，張靜廬等校點，《光緒朝東華錄》，卷 5。北京：中華書局，1958。
伯　耀，〈改良新戲系轉移社會風氣的妙藥〉，《嶺南白話雜誌》（廣州），期 4，戊申正月二十九日。
余　治，《重訂得一錄：各項善堂義舉規章》。上海：人文印書館，1934。
李廷翰，《教育叢稿》，第 5 種。上海：中華書局，1921。
來風儀編，《張愛玲散文全編》。杭州：浙江文藝出版社，1995。
周作人，〈論黑幕〉，《每週評論》（北京），1919 年 1 月 12 日。
周作人，《知堂回想錄》。香港：三育圖書公司，1980。
周逢儒，〈青年期之身弱多病，其原因在喜閱小說〉，《紹興醫藥學報》（紹興），卷 12 號 7，1922 年 7 月 20 日。
孟憲承等編，《中國古代教育史資料》。北京：人民教育出版社，1985。
祁伯文，〈中國女子教育之史的發展〉，《青年》（北京），卷 1 期 10、11，1938 年 11 月 1 日、11 月 15 日。
阿英編，《晚清文學叢鈔‧小說戲曲研究卷》。北京：中華書局，1960。
阿英編，《晚清戲曲小說目》。上海：上海文藝聯合出版社，1954。
姜義華主編，《康有為全集》，冊 3。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2。
姚公鶴，《上海閒話》。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9。
故宮博物院明清檔案部編，《清末籌備立憲檔案史料》，冊上。北京：中華書局，1979。
胡祥翰等，《上海小志‧上海鄉土志‧夷患備嘗記》。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9。
孫寶暄，《忘山廬日記》。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3。
徐章垿，〈論小說與社會之關係〉，《友聲》（杭州），期 1，1913 年 8 月。
海上說夢人，《歇浦潮》。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1。
張恨水，《寫作生涯回憶》。北京：人民文學出版社，1982。
張靜廬輯注，《中國近現代出版史料‧補編》。上海：上海書店，2003。
曹伯言整理，《胡適全集》，冊 27。合肥：安徽教育出版社，2003。
曹聚仁，《曹聚仁雜文集》。北京：生活‧讀書‧新知三聯書店，1994。
梁啓超，《飲冰室合集》，文集之一、三、六、三十二。北京：中華書局，1989。
陳大悲，〈中國的新劇沒有迎合群眾心理嗎〉，《曙光》（北京），卷 2 期 3。
陳平原、夏曉虹編，《二十世紀中國小說理論資料》，卷 1。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1989。
陳光輝，〈改良戲劇芻言〉，《復旦》（上海），期 2，1916 年 6 月。
陸士諤，《新上海》。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7。
曾　樸，《孽海花》，收入吳組緗等主編，《中國近代(1840-1919)文學大系‧小說集》，冊 4。上海：上海書店，1992。

編者不詳，《最新初等小學國文教科書》。湖南機器印刷局印行，無具體出版日期，上海：復旦大學圖書館藏。
舒新城，《我和教育》。台北：龍文出版社，1990。
黃遠庸，《遠生遺著》。北京：商務印書館，1984。
惲毓鼎著，史曉風整理，《惲毓鼎澄齋日記》，冊 1。杭州：浙江古籍出版社，2004。
新，〈新小說之平議〉，《漢口中西報》（漢口），1909 年 4 月 23 日。
楊樹達，〈教育和文字〉，《湖南教育月刊》（長沙），卷 1 號 1，1919 年 11 月 1 日。
畸　零，〈小說與社會〉，《大公報》（長沙），1919 年 8 月 28 日。
萬仕國編著，《劉師培年譜》。揚州：廣陵書社，2003。
董瑞椿，〈廣女學議〉，《實學報》（上海）。北京：中華書局，1991 年影印本。
裘毓芳，〈勸看白話報〉，《無錫白話報》（無錫）。出版信息存疑，上海：復旦大學圖書館館藏。
箸　夫，〈論開智普及之法首以改良戲本爲先〉，《之罘報》（煙台），期 7，光緒三十一年四月十一日。
趙晉輯錄，〈戊戌變法前後至辛亥革命報刊發表的戲曲劇作編年〉，《戲曲研究》，輯 6。北京：文化藝術出版社，1982。
劉永文，《晚清小說目錄》。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8。
劍村遊客輯，《上海》。無出版地點和單位，上海：上海圖書館藏，光緒二十九年鉛印本。
鄭大華整理，《胡適全集》，冊 2。合肥：安徽教育出版社，2003。
鄭振鐸、傅東華編，《文學一周年紀念特輯：我與文學》。上海：生活書店，1934。
魯迅先生紀念委員會，《魯迅全集》。北京：人民文學出版社，1973。
樽本照雄，《新編增補清末民初小說目錄》。濟南：齊魯書社，2002。
錢　湘，〈續刻蕩寇志序〉，收入俞萬春，《蕩寇志》。上海：世界書局，1935。
戲曲改良公會第一種，《審吉平》。無具體出版資訊，上海：復旦大學圖書館藏。
總務司案牘科，《學部奏諮輯要續編》。原書爲線裝，無具體出版信息，上海：上海辭書出版社圖書館藏本。
薛正興主編，《李伯元全集》，冊 5。南京：江蘇古籍出版社，1997。
羅家倫，〈今日中國之小說界〉，《新潮》（北京），卷 1 號 1，1919 年 1 月 1 日。
羅惇融，《庚子國變記》。上海：上海書店，1982。
蘇曼殊等著，《民權素筆記薈萃》。太原：山西古籍出版社，1997。
鐵　秋，〈論地方宜設演說研究會〉，《國民白話日報》（上海），戊申八月廿四日。

二、專書

羅伯・丹屯(Robert Darnton)著，國立編譯館主譯，呂健忠譯，《貓大屠殺：法國文化史鉤沉》。台北：國立編譯館、聯經出版事業股份有限公司，2005。
王德威著，宋偉傑譯，《被壓抑的現代性——晚清小說新論》。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2005。

伯克(Peter Burke)著，楊豫等譯，《歐洲近代早期的大眾文化》。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5。
李孝悌，《清末下層社會的啓蒙運動》。石家莊：河北人民出版社，2001。
高彥頤(Dorothy Ko)著，李志生譯，《閨塾師：明末清初江南的才女文化》。南京：江蘇人民出版社，2005。
費孝通，《鄉土重建》。上海：觀察社，1948。
黃愛華，《中國早期話劇與日本》。長沙：嶽麓書社，2001。
錢鍾書，《管錐編》，冊 1。北京：中華書局，1994。
霍布斯鮑姆(Eric Hobsbawm)著，李金梅譯，《民族與民族主義》。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0。
羅志田，《近代讀書人的思想世界與治學取向》。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2009。
羅爾綱，《水滸傳原本和著者研究》。南京：江蘇古籍出版社，2000。
Altick, Richard D. *The English Common Reader: A Social History of the Mass Reading Public, 1800-1900*. Columbus: Ohio State University Press, 1998.
Cavallo, Guglielmo, Roger Chartier, eds. *A History of Reading in the West*. Translated by Lydia G. Cochrane. Amherst & Boston: University of Massachusetts Press, 1999.
Certeau, Michel de. *The Practice of Everday Life*. 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1988.
Chartier, Roger. *The Order of Books: Readers, Authors and Libraries in Europe Between the Fourteenth and Eighteenth Centuries*. Translated by Lydia G. Cochrane. Cambridge: Polity Press, 1994.
Evans, Richard J. *In Defence of History*. London: Granta Books, 2000.
Ginzburg, Carlo. *The Cheese and the Worms: The Cosmos of a Sixteenth-Century Miller*. Translated by John Anne Tedeschi. London and Henley: Routledge & Kegan Paul, 1980.
Hesse, Carla. *Publishing and Cultural Politics in Revolutionary Paris, 1789-1810*. 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1991.
Lyons, Martyn. *Readers and Society in Nineteenth－Century France: Workers, Women, Peasants*. New York: Palgrave Macmillan, 2001.
Rawski, Evelyn Sakakida. *Education and Popular Literacy in Ch'ing China*. Ann Arbor: The University of Michigan Press, 1979.

三、論文

李仁淵，〈新式出版業與知識份子：以包天笑的早期生涯爲例〉，《思與言》（台北），卷 43 期 3，2005 年 9 月，頁 53-104。
李仁淵，〈閱讀史的課題與觀點：實踐、過程、效應〉，收入復旦大學歷史系、復旦大學中外現代化進程研究中心編，《新文化史與中國近代史研究》。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9。
李孝悌，〈中國近代大眾文化中的娛樂與啓蒙——以改良戲曲爲例〉，收入張啓雄主編，《二十世紀的中國與世界》。台北：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2001。
許洪新，〈民國初教育家李廷翰史料鉤沉〉，收入林克主編，《上海研究論叢》，輯 18。上海：

上海人民出版社，2007。
張仲民，〈清末報刊上改良小說和戲曲論述篇目(1900-1911)〉，收入復旦大學歷史系、復旦大學中外現代化進程研究中心編，《新文化史與中國近代史研究》。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9。
張仲民，〈物質、商業與傳播——五四新文化運動的社會化和地方化〉，待刊。
張朋園，〈勞著《清代教育及大眾識字能力》〉，《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集刊》，期 9，1980 年 7 月，頁 455-462。
陳平原，〈有聲的中國——「演說」與近現代中國文章變革〉，《文學評論》（北京），2007 年第 3 期，頁 5-21。
傅秋敏，〈論汪笑儂的戲曲改良活動〉，《戲劇藝術》（上海），1988 年第 3 期，頁 45-54。
羅志田，〈中國傳統的負面整體化：清季民初反傳統傾向的演化〉，收入李國章、趙昌平主編，《中華文史論叢》，輯 72。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3。
Li, Yu. “A History of Reading in Late Imperial China, 1000-1800.” Ph. D. dissertation, Department of East Asian Languages and Literatures, The Ohio State University, 2003.
Rose, Jonathan. “Reading the English Common Reader.” In David Finkelstein and Alistair McCleery, eds., *The Book History Reader*. London and New York: Routledge, 2002.

Enlightening the Masses: Elite Discourse on Popular Reading Habits in the Late Qing Period

Zhang Zhong-min*

Abstract

The history of prohibited books cannot be excluded from the history of reading. Condemnations of and policies actions against the circulation of *yinci xiaoshuo* (pornographic novels) and the like among the people never died out in premodern China. Reflecting Western intellectual influences, progressive intellectuals in the late Qing began to be aware of the important social functions of novels and drama. They reflected on the linkage between the popular novels and drama performances and the Boxer Uprising. They brought together reading, enlightenment, and the nation-state to purify the reading habits of the lower strata, enlighten the masses, and create modern citizens by replacing *yinci xiaoshuo* with *xin xiaoshuo* (new fiction) and *xin xiqu* (new drama). Nevertheless, new fiction and reformed drama were themselves open to varying interpretations, and created a discoursive space for multiple voices carrying different meanings for different audiences, not necessarily enlightenment-oriented. As well, the inner logic of the popular culture of reading can never wholly be subjected to outside discipline. This limited the efforts of intellectual elites to purify popular reading habits.

Keywords: history of reading, pornographic novels, lower strata, *xin xiaoshuo* (new fiction), *xin xiqu* (new drama), reading habits

* History Department, Fudan University